

Richard Yates

Eleven Kinds of Loneliness

十一种孤独

[美] 理查德·耶茨 著

陈新宇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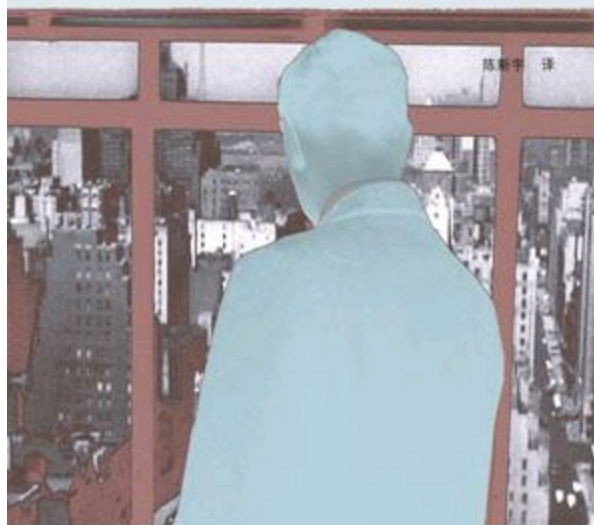
Richard Yates

Eleven Kinds of Loneliness

十一种孤独

[美] 理查德·耶茨 著

陈新宇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ibook.178.com

目录

Content

[前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前言

译/ 陈新宇

文/[美] 理查德·耶茨

《十一种孤独》以冷峻的笔触描绘了美国二战后五六十年代的纽约人的生活，写的是人的脆弱、对生活无可奈何地忍受。被誉为纽约的《都柏林人》。该书里十一种孤独的人，都是缺乏安全感、生活不太如意的人：曼哈顿办公楼里被炒的白领、有着不朽想象力的出租车司机、屡屡遭挫、一心想成为作家的年轻人、即将结婚十分迷茫的男女、古怪的老教师、新转学的小学生，肺结核病人、老病号的妻子、爵士钢琴手、郁郁不得志的军官、退役军人。

以下四篇小说译自2002年Picador出版的《理查德·耶茨短篇小说集》(The Collection Stories of Richard Yates)

第一章

建筑工人

众所周知，作家写作家，很容易制造出最垃圾的文字。一篇小说如果以“克拉格掐灭香烟，扑向打字机”这样开头，估计在美国没有哪个编辑会想读第二句。

所以别担心，这是一篇关于出租车司机、电影明星和著名儿童心理专家的小说，不矫情、没废话，这是我的承诺。但您得有点耐心，因为这里面也有一位作家。我不会把他叫做“克拉格”，但也可以保证他不幸是那些人物中唯一感性的人，但我们要跟他长期相处，您最好还是把他想得笨拙、鲁莽一点，因为不论是在小说中还是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作家都如此。

十三年前，也就是1948年，我二十二岁，受雇于合众国际社，在财经新闻科从事撰稿工作。周薪五十四美元。这算不上什么好差事，但有两个好处：一是若有人问我是干什么的，我便说“在合众国际社工作，”这话听上去颇为自豪；二是每天早上，我身穿廉价防雨风衣，一脸倦容出现在新闻大楼前，风衣由于缩水小了一号，我穿着好像有点紧。头上一顶戴旧了的褐色费多拉帽(注：一种帽顶相当低并有纵长折痕且侧面帽沿可卷起或不卷起的软毡帽。)(要在以前我会说“一顶破帽子”，我很欣慰现在多少知道诚实地谴词造句了。这顶帽子戴得过多，在我紧张时无数次神经兮兮地捏拢、整理它的形状，整来整去；其实帽子根本没有破)。我喜欢每天的那几分钟，走过地铁出口和新闻大楼之间最后几百码的斜坡，感觉自己就是欧内斯特·海明威，正要去《堪萨斯市星报》上班。

海明威是不是在二十岁生日前就已从战场复员回家？嗯，我也是；好吧，可能我没有受过伤、得过奖章，但本质一样。海明威有没有为上大学浪费时间、会耽误职业生涯之类问题烦心过？见鬼，没有；我也没有。海明威是不是真的很关心新闻事业？当然不是；这里有些微差别，你看，他在星报成功突破，而我则在财经新闻科按部就班地工作，郁闷不已。可重要的是，我知道海明威会是第一个同意我看法的人，即作家必须从某个地方起步。

“今天，国内公司债券异常高涨，交易略显活跃……”这就是我每天

为合众国际社电报写的文章，还有“节节攀升中的石油股价逐步进入活跃的场外交易市场”，以及“立鼎滚轴公司董事会宣布”——(苍天在上，什么叫做认购期权、什么叫认沽期权，什么是偿债基金债券？如果我知道就让我见鬼去)，电报打字机嘎吱嘎吱，卡嗒作响；华尔街股票行情自动收录器滴答滴答，周围的每个人都在讨论棒球；我则几百字几百字地写，虽然从来没搞明白过这是什么意思。谢天谢地，总算到下班时间了。

每每想到海明威年纪轻轻就已经结婚，我总是很开心；在这点上我跟他一样。我妻子叫琼。我们住在西十二街的最西头，是三楼上一间大大的，有三个窗的房间，如果它不在左岸(注：Left Bank，法语Rive droite。塞纳河左岸圣日耳曼大街、蒙巴纳斯大街和圣米歇尔大街构成的，一个集中了咖啡馆、书店、画廊、美术馆、博物馆的文化圣地。)，当然不是我们的错。每晚，吃过晚饭后，在琼洗碗时，房间里是一片令人尊敬、甚至是虔诚的静谧。这是我在角落那三折屏风后的休息时间，那里摆了张桌子、上面放着学生台灯，手提式打字机。当然，就是在那儿，在台灯白色光芒的照耀下，我与海明威之间那点微弱的可比性经受了最大的考验。因为没有任何《密歇根湖上》这样的小说出自我的机器；我的打字机也没打出《三天大风》或《杀手们》(注：这三篇小说都是海明威的短篇小说。)这样的小说；实际上，这部机器经常是什么小说也打不出，即使有什么被琼称为“非凡的”东西，我内心深处也知道那总是、总归还是很糟糕的东西。

许多个夜晚，我所做的就是躲在屏风后发呆——读纸板火柴里印的每一个字，又或者，读《星期六文学评论》封底的广告——这年秋天，也是这样一个夜晚，我无意中读到下面几行：

为天才作家提供与众不同的自由撰稿机会。要求有丰富想象力。

伯纳德·西维尔。

——下面还有电话号码，看上去是布朗克斯(注：Bronx，纽约五大区之一，纽约市最北端的黑人区。)的区号。

那天晚上，我从屏风后走出来，琼从洗碗池边转过身，手上的肥皂水滴在摊开的杂志上。我不想用我和琼之间简单、诙谐的海明威式的对话来骚扰你们。我也会跳过我与伯纳德·西维尔之间礼貌的而无实质内容的电话交谈。我要跳过几天到后来的某个晚上，我坐了一个小时的地

铁，最终找到他的寓所。

“是普林提斯先生吗?”他问道。“你叫什么?鲍勃?好的，鲍勃，我是伯尼(注：伯纳德的昵称。)。进来吧，随便点。”

我觉得伯尼和他的家都值得在此仔细描述。他大约四十五到五十岁之间，比我矮得多，也壮实得多，穿着件看上去挺贵的灰蓝色运动衫，下摆没有塞到裤子里去。他的头大我一半，稀疏的黑发齐刷刷地梳到后脑勺上，好像他刚刚站着仰面洗了个淋浴;他的脸是我见过最坦率最自信的脸。

公寓整洁、宽敞，奶白色调，整个地面全铺着地毯，到处是拱门。在靠近衣柜附近的狭窄壁龛处(“脱下大衣和帽子吧;好。把它挂在这个钩子上，我们就安顿好了;好。”)，我看见一堆相框，全是一战士兵的不同合影，可起居室墙上却没有一张这样的照片，只有几只精美的铁制灯架，还有几面镜子。走进房间，你不会再去注意有没有相片，因为你所有注意力会被吸引到唯一的一件令人惊异的家具上。我不知道你们会怎么称呼它——壁橱?——不管它叫什么，它似乎连绵不绝没有尽头，有些地方齐胸高，有些地方又只到腰部，至少用了三种不同深浅的褐色装饰面板。有个地方用来放电视机，有一部分是无线电留声机;有个地方薄薄的，做得像个架子，放着盆栽或小雕像;有个地方全是镀铬把手和花里胡哨的滑动板，像个酒吧。

“喝姜汁汽水吗?”他问。“我妻子和我都不喝酒，但我可以给你倒杯姜汁汽水。”

我想伯尼在晚上面试他的写作应聘者时，他妻子一定经常出去看电影;我后来倒是见过她，以后会说到的。不管怎样，那第一个晚上，只有我们俩，坐在光滑的仿皮椅上，喝着姜汁汽水，谈的可完全是正事。

“首先，”他说，“告诉我，鲍勃。你知道《载客中》(注：My Flag Is Down，纽约出租车司机James V Maresca的日记。)吗?”我还没来得及问他说的是什么，他已从壁橱的某个凹陷处抽出这本书，递过来——这是本纸面本的书，你可在药房(注：照药方配药，出售药品和其它杂货的商店，实际是一种杂货店。)这种地方买到，是纽约出租车司机的回忆录。接着他开始跟我说这本书的内容，而我则看着这本书，点着头，只希望自己没离开过家。

伯纳德·西维尔也是个出租车司机。他干这行已经二十二年了，跟我的岁数一样大，最近两三年，他开始想为什么他不能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小说，这小说难道不是一笔财富吗。“我想你看看这个，”他说。这次，壁橱里生出了一个干净的小盒子，三寸宽五寸长的文件卡片盒。他告诉我里面记录了几百条不同的经历；还让我明白不一定完全真实，但他向我保证，至少每个故事的主要情节是真的。我能想象真正优秀的捉刀人会如何对待这样丰富的素材吗？或者说我能想象这样的作家将从杂志销量、作品版税和随之而来的电影版权中赚取多么丰厚的回报吗？

“嗯，我不知道，西维尔先生。这事我得考虑考虑。我想我得先读读这本书，再看看有什么——”

“不，等等。你抢在我前面了，鲍勃。首先，我并没有要你读那本书，因为你从中学不到什么。那人写的全是黑帮、女人、性、酒这类东西。我完全不同。”我坐在那里，大口喝着姜汁汽水，好像渴得不行，其实只希望他快点讲完他究竟如何不同，我好离开。伯尼·西维尔是个热情的人，他跟我说；他是个普通、平凡的家伙，有颗博爱的心，有真正的人生观；我明白他的意思吗？

我有个小花招，可以将自己与他人隔绝开来(很容易；你只要做到：双眼直盯着说话者的嘴巴，观察他说话的节奏，嘴唇、舌头无穷变幻的形状，你就什么也听不见了)，我正要这样做时，他又说道：

“别误会我，鲍勃。我还从没要哪个作家为我写过一个字而不付钱的。你为我写作，你会得到你应得的报酬。当然，这场游戏目前这个阶段，还不会有大笔的钱，但你还是会得到报酬。够公平吧？来，我给你再添满。”

这是他的建议：他从这些卡片里给我思路；我把它变成伯尼·西维尔以第一人称写的短篇小说，长度大概一两千字，他保证立即付款。如果他喜欢我写的东西，将会给我更多东西写——如果我能应付得过来，就一周一篇——除了每篇故事付的钱之外，当然，这些故事还会带来其他收入，我完全可以期望获得相当大比例的分成。他神秘兮兮地看着我，提到他推广这些短篇小说的计划，虽然他极力暗示《读者文摘》可能对此感兴趣，但他还是坦白承认目前还没有与哪家出版商联系过最终将这些短篇小说汇集成书的事宜，但他说他可以向我提几个名字，保管我听后眼珠子都会掉出来。比如说，我有没有听说过曼尼·威德曼？

“哦，也许，”他说，大笑起来，“也许说威德·曼莱你会更知道些。”这是个红得发紫的电影明星，在三四十年代他就像今天科克·道格拉斯、伯特·兰开斯特这样出名。威德·曼莱是伯尼在布朗克斯区的小学同学。他们有共同的朋友，所以到现在关系一直还很密切，有件事也让他们友谊常青，那便是曼莱再三说过想要将纽约出租车司机，这个粗鲁可爱的伯尼·西维尔多姿多彩的生活搬上荧幕或拍成电视连续剧，由他来演伯尼·西维尔。“现在，我还要告诉你另一个名字，”他说。这次他说那个名字时特意斜眼瞧着我，仿佛可以用我知不知道这个名字来衡量我的综合教育水平。“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

幸运的是，我还不是一脸茫然。准确地说，这名字虽不是如雷贯耳，但还不至于藉藉无名。这是《纽约时报》上经常出现的名字，成千上万的人对他们依稀有点印象，因为多年来我们经常看到这种名字被体面地提及。噢，这名字可能没有“莱昂内尔·特里林(注：(Lionel Trilling, 1905-1975)，犹太美国人，文学批评家、作家、教师。)”或“莱因霍尔德·尼布尔(注：(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是本世纪美国最有影响的基督教神学家。)”那样的影响力，但基本在同一水平线上；你可能将它与“亨丁顿·哈特福(注：(Huntington Hartford, 美国金融家，也是艺术赞助商。)”或“莱斯里·R·格罗夫斯(注：莱斯里·R·格罗夫斯(Leslie R. Groves.)：美国陆军中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计划(即曼哈顿计划)的总负责人，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掷原子弹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归为一类，比“纽博尔德·莫里斯(注：(Newbold Morris, 1902-1966)，美国政治家、律师、纽约市议会议长，曾两次被提名为纽约市市长竞选人。)”的知名度稍高一两个档次。

“你说的那人，”我说。“是研究那什么儿童压力的人吗？”

伯尼朝我神圣地点点头，原谅了我的粗鄙，再次正确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我是说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杰出的儿童心理学家。”

你看，早在科罗夫博士成名前，他曾是布朗克斯区一所小学的老师，正是两个最顽皮、可爱的淘气包伯尼·西维尔和那个电影明星曼莱·什么的老师。他一直温和地关注着这两个年轻人，如果能凭在出版界的影响促成他们的计划，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开心呢。看起来，他们三人已是万事俱备，现在缺的是最终要素，最捉摸不定的催化剂，执行这项工作的最佳作家。

“鲍勃，”伯尼说，“跟你说实话吧。我找了一个又一个的作家来

写，他们都不合适。有时候，我几乎不相信自己的判断了；我把他们写的东西拿给科罗夫博士看，他摇头，说，‘伯尼，再试试。’”

“你看，鲍勃，”他坐在椅子上，热切地倾身向前。“这不是什么一时兴起的想法；我不会欺骗谁。这种事是一种建筑活动。曼莱、科罗夫博士和我自己——我们在建造这东西。噢，别担心，鲍勃，我知道——什么，我看上去有那么傻吗？——我知道他们建筑的方式和我的不一样。不过，凭什么他们就该和我的一样呢？一个电影明星？一个知名学者和作家？你以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可建之物吗？你以为他们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做吗？当然有。但是鲍勃，说实话，他们有兴趣。我可以给你看他们的信，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好多次带着妻子坐在这间屋子里，我可以告诉你曼莱有多少次一个人在这里。我们连续几小时讨论不休。他们都很感兴趣，这你不用担心。所以你明白我跟你说的了吗，鲍勃？说实话，这事是一种建筑活动。”他开始比划着建筑的手势，两手从地毯开始，把一块块看不见的木板垒在那里，直到把它们砌成一座他的名利之楼，我们的金钱和自由之楼，高到齐眉。

我说听上去当然不错，但如果他不介意，我更想知道每个故事马上能付多少钱。

“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个答案，”他说。他又去壁橱那里——像书桌的某部分——从纸堆里清拣出一张个人支票。“我不仅要告诉你，”他说。“还要给你看。够公平吧？这是我给上个作家的。拿着，看看吧。”

这是张作废的支票，上面写着伯纳德·西维尔见票即付给某人金额二十五美元整。“读一下！”他坚持道，仿佛那张支票本身就是一篇不同凡响的散文作品。他看着我把支票翻过来，看着反面那个人的背书，这是在伯尼自己那模糊不清的签名下的某个签名，这是关于提前支付全部金额的，还有银行的橡皮图章。“你看还行吗？”他问道。“就这么说定了。现在清楚了吗？”

我想一切都很清楚了，所以我把支票还给他，问他是不是现在可以给我看看那些卡片了，不论怎样，我们最好马上开始。

“等一下，等一下！先别忙。”他的脸笑开了花。“你真是急性子，你知道吗？鲍勃？我是说我喜欢你这样的，但你不觉得我该对走到我这里来向我要支票，自称作家的人有点了解吗？不错，我知道你是个新闻人，但我知道你是作家吗？为什么不把你膝盖上的东西给我看看呢？”

这是个淡黄色牛皮纸信封，里面装着复印的两个短篇小说，这是我这一生中写过的唯一拿得出手的两个短篇。

“啊，”我说。“没问题。给。当然这与你所说的那种——风格完全不同。”

“不要紧，不要紧。它们当然会不同，”他说，打开信封。“你放松点，我来看看。”

“我的意思是，它们是那种非常——嗯，文学性的，我想该这么说。我觉得它们不能让你真正了解我的——”

“我说了，别紧张。”

他从运动衫的口袋里取出无边眼镜，身子往后靠着费力地戴上眼镜，皱着眉头，开始看起来，用了很长时间才看完第一篇小说的第一页。我看着他，心想这可能是我文学生涯的最低谷了。一个出租车司机，天啊！终于第一页翻了过去，接着第二页却很快翻了过去，明显看得出跳过去了。接着，第三页、第四页——一共有十二或十四页的小说——我紧紧握着温暖的空姜汁汽水杯，仿佛做好准备随时缩回手，将杯子狠狠砸向他的脑袋。

开始看时，他微微点头，不太坚定，越往后看，点头越来越肯定，这样直看到最后。看完后，他满脸迷惑，又回过头再看最后一页；然后他放下这篇，拿起第二篇——没有读下去，只是检查一下长度。显然他一个晚上看这么多足够了。最后他取下眼镜，满脸堆笑。

“嗯，很好，”他说。“我不再花时间看那篇了，第一篇就很好。当然，自然，正像你说的，你带来的东西风格完全不同，对我而言有点难——你知道——”他挥挥手，挥去了这个复杂句子的其余部分。“我跟你讲，鲍勃。不光是读这些小说，我还要问你几个关于写作的问题。例如。”他闭上眼睛，指尖优雅地碰了碰上眼皮，陷入思考，也许为了加重他下一句话的份量，假装在思考。“例如，让我问问你：假设有人给你写信，说，‘鲍勃，我今天没时间给你写短信，所以我还是给你写封长信算了。’你知道他们这是什么意思吗？”

别担心，这个晚上我发挥得好极了。我可不想不做努力就让这二十五美元从我手中溜走；无论我的答案是多么严肃的胡说八道，毫无疑问

在他脑海里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这位来应聘的作家知道文章浓缩的困难与价值。不管怎样，他看上去很满意。

“好。现在我们换个角度。我刚才提到了‘建筑’；嗯，你看，你知道写小说也是建造什么吗？就像建座房子？”他很满意自己创造的这个比喻，甚至等不及接受我奖励给他的认真的点头赞许。“我是说一栋房子得有屋顶，但如果你先建屋顶就麻烦了，是不是？在你建屋顶前，你得砌好墙。在你砌墙前，你得打好地基——我的意思是从头至尾。在你打好地基前，你还得用推土机平整土地，在正确的地点挖合适的坑。对不对？”

我完全同意他的说法，可他还是忽视了我全神贯注的、谄媚的凝视。他用手背蹭了蹭鼻梁；然后又洋洋得意地转向我。

“那好，假设你为自己建造一座那样的房子。那会怎样？当房子建好后，你问自己的第一个问题会是什么？”

我看得出他才不在乎我含糊不清的声音说没说出这个问题。他知道问题是什么，他迫不及待要告诉我。

“窗户在哪里？”他摊开双手，迫切地问。“就是这个问题。光线从哪里进来？因为你明白我说的光线从哪里进来是什么意思，对吗，鲍勃？我是说小说的观点；文中蕴含的真理；还有——”

“启示之类的，”我说，他用力地、快乐地弹了个响指，停止了对第三个名词的继续搜寻。

“是它。就是它，鲍勃。你说对了。”

就这么定了。我们又喝了杯姜汁汽水，敲定了，他用拇指翻着那堆思路卡片，想找一张做我的测试作业。他选的一次“经历”是伯尼·西维尔就在出租车里挽救了一对神经质夫妇的婚姻，他只在那对夫妇争吵时，通过后视镜打量他们，说了几句仔细斟酌的话。至少，大意如此。实际上卡片上是这样写的：

上层男人和妻子(帕克大道)在车里开始争吵，情绪十分沮丧，夫人开始叫着要离婚。我从后视镜里看着他们，我说了几句，不久我们都笑了。关于婚姻的小说等。

伯尼显得对我很有信心，认为我有能力把它写出来。

在过道上，他小心翼翼地从我衣柜里拿出我的防雨风衣，帮我穿上时，我有时间从容地看了看那些一战时的照片——长长一列，都是用镜框框住的泛黄快照，里面全是笑着的男人，胳膊搭着胳膊，中间的一张是阅兵场上的孤独号手，远处是灰蒙蒙的兵营，一面旗帜高高飘扬，这可能是某本旧《美国军团杂志》的封面照，标题写的像是“职责”——优秀的军人，挺拔笔直，立正站着的身影，连同他嘴上简单、嘹亮的长号一起，都增强了男子气十足的气概，金星母亲们(注：一战结束后，美国成立了一个Gold Star Mother Club，该组织为在战争中失去子女的妈妈们提供帮助。)如果看到一定会热泪盈眶。

“我看你挺喜欢我那个小伙子，”伯尼怜爱地说。“我打赌你猜不出现在那个小伙子是谁了。”

威德·曼莱·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莱昂内尔·特里林？可我想我真的知道，甚至在瞥见他脸红得意之前就知道了，那个小伙子就是伯尼自己。也许听上去有点傻，我得说当时我对他有点小小的，但真诚的敬意。“哦，我简直不敢相信，伯尼。你看上去——你看起来神气极了。”

“总之，那时候瘦多了，”他说着，拍拍自己皮光肉滑的大肚子，送我到门口。我记得我低下头盯着他那张愚蠢而松弛的大脸，试着在那里寻找照片上的号手。

回家的路上，地铁摇摇晃晃，我直打嗝，姜汁汽水的味道泛上来，我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作家写几千字挣二十五美元也不错，有些作家混得比这还差呢。二十五美元几乎是我在国内公司债券、偿债基金债券上耗去的四十个悲惨小时所挣的一半；如果伯尼喜欢这第一篇的话，如果我可以每周给他写一篇的话，就意味着收入将增加百分之五十。七十九美元一周！如果有那么一笔收入，再加上琼当秘书每周挣的四十六元，根本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去巴黎(也许我们在那里碰不上格特鲁德·斯泰因(注：(Gertrude Stein, 1874-1946)，生于匹次堡一个富裕的德国犹太人家庭。一九〇二年定居巴黎。她在巴黎创立了一个有名的沙龙，并不断写作。著有《地理与戏剧》(Geography and Plays, 1922)；小说《露西高兴做礼拜》(Lucy Church Amiably, 1930)；《三幕剧中四圣人》(Four Saints in Three Acts, 1934)、《毕加索》(Picasso, 1938)等作品。))以斯拉·卢米斯(注：(1885-1972)，美国作家。他的诗作对现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未完稿的诗篇》(1925-1960年)，他向文学杂志大量

投稿并对T·S·艾略特，詹姆斯·乔伊斯和海明威等作家产生影响。)，也许我写不出《太阳照常升起》，但对我的海明威计划而言，最初的自我放逐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这可能十分有意思——至少告诉别人这个可能十分有趣：我将成为出租车司机的雇佣文人，建筑工的建筑工。

不管如何，那个晚上我沿着西十二街一路跑回家，如果我没有大声笑着、叫着打断琼说话，围着她扮小丑，那不过因为是我强迫自己靠着楼下的邮箱站了好一会，好让自己呼吸平稳，让自己变得文雅、幽默，我打算用这样的表情告诉她这件事。

“好了，但你觉得是谁来付这笔钱呢？”她问道。“他不可能自己掏腰包的，那会是谁？一个出租车司机可付不起二十五块一周，不管持续多长时间，是不是？”

这事我可没想过——只有她这样的人才会提出这样致命的逻辑问题——但我那可笑的浪漫念头占了上风，让她别管这问题。“谁知道？见鬼，谁又会关心？也许是威德·曼莱出钱。也许是什么博士出钱。问题是，反正有人掏钱。”

“好了，”她说，“那么，好吧。你觉得写这样一个故事得花多少时间？”

“噢，见鬼，根本用不了多久。周末我只要花两三个小时就可以把它打发掉。”

可是我没有做到。我花了整个周六下午和晚上来写一个又一个虚构的开头；我沉溺于那对吵嘴夫妇的对话上，从理论上说，我无法确定伯尼从后视镜中能看到多少，也怀疑在那种场合下，不管出租车司机能说出什么来，那个男人竟没有叫他住嘴，叫他只管看路开车。

到星期天下午，我走来走去，折断铅笔，把它们扔进废纸篓，嘴里吼着见鬼去吧；让一切都见鬼去吧；显然我甚至没法做一个该死的白痴笨蛋般的出租车司机的该死的捉刀人。

“你努力过了头，”琼说。“噢，我知道会这样的。你太文绉绉，别人受不了，鲍勃。这太可笑了。你只要想想那些读过或听过的让人伤感掉泪的东西。想想欧文·伯林(注：Irving Berlin (1888-1989) 美国词曲作家。))。”

我对她说，别管我，如果她还不做自己的事去，我就马上把她的欧文·伯林塞进她嘴里。

但那个晚上，正如欧文·伯林自己曾说的，某种奇妙之事发生了。我编完了那个假故事，我建完了它。首先，我推平了土地，挖了坑，为自己打好了地基；接着，我搬来木材，砰，砰、砰——墙砌起来了，屋顶也搭好了，可爱的小烟囱也竖在顶上。噢，我也建了好多窗户——大的、四方的窗户——光线可以照进来，没有一丝阴影，阳光下的伯尼·西维尔是最聪明、最温柔、最勇敢和最可爱的人，他曾说“朋友们。”

“写得太好了，”琼在吃早餐时跟我说，她读完了那篇东西。“噢，写得棒极了，鲍勃。我敢肯定这正是他想要的那种东西。”

确实如此。我忘不了伯尼坐在那里，一手端着姜汁汽水，一手拿着我那篇手稿读着，手还有点颤抖，在我为他建造的小房间里探索着所有感人而恰到好处的奇迹。我现在还敢打赌，他从没有读过那样的文章。我看着他一扇窗户一扇窗户地探索，看着他的脸因为它们的光芒显得十分神圣。读完后，他站了起来——我们都站了起来——他握着我的手。

“美极了，”他说。“鲍勃，我开始就有种预感，你能写好，但说实话，我没想到你写得这么好。现在你心里可能想要支票，可我告诉你。我不开什么支票了，我要直接付你现金。”

从他那出租车司机靠得住的黑色钱夹里，他摸索出一张五美元的钞票，放到我手上。显然他想隆重地把钞票一张一张放到我手里，弄得像个仪式，因此我站在那里低头笑着，等着下一张钞票；我站在那里，摊开着手，抬起头，看见他把钱夹收起来了。

才五块钱！直到现在我还希望我能冲着他咆哮，至少我要语带怒气，把那揪心的愤怒表达出来——这可以省却以后多少麻烦——可是当时我只是低声而谦卑地问：“五块钱？”

“对！”他脚跟着地快活地向后晃了一下。

“好了，可是伯尼，我说当初我们是怎么定的？我意思是，你给我看的那张支票，我——”

他慢慢收回了笑容，脸上露出惊异和受伤的表情，仿佛我朝他脸上

啐了口唾沫。“噢，鲍勃，”他说。“鲍勃，这是什么？看看，我们别再捉迷藏了。我知道我给你看过那张支票；我还可以再给你看一次。”他气得运动衫的折痕处都一起一伏，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走到壁橱那儿翻腾一通，把支票找出来。

还是那张支票，没错。金额还是二十五美元整；但是背面在那人签名之上，伯尼皱巴巴的签名连同银行橡皮印章一起，现在都他妈的清晰可辨了。当然，上面写着：“提前支付五篇文章的全部金额。”

所以我并没有被打劫——也许，只是被骗而已——现在让人恶心的姜汁汽水给我一种感觉，自己像个傻瓜，我敢肯定这种感觉欧内斯特·海明威在他一生中可能从没体会过。

“我错了吗，鲍勃？”他问道。“我错了吗？”他让我再坐下，尽量微笑着跟我解释。我怎么可能以为他说的是一次二十五美元呢？难道我不知道出租车司机拿回家的是什么样的钱？噢，某些自己有车的出租车司机可能是另一番景象；但你们这些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你们这些出租汽车公司的出租车司机？一周只挣个四十、四十五，如果运气好的话，可以挣个五十块。即使像他自己，没有孩子，老婆在电话公司上整班，也不容易。如果我不信，尽管去问任何一个出租车司机；日子真不好过。“我是说，难道你觉得还有谁会为这样的文章买单呢？你会吗？你会吗？”他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几乎要笑起来，好似在说，如果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一定是昨天才来到这个世上的。

“鲍勃，我对这个误会感到很抱歉，”他送我到门口时说，“但是我很高兴的是我们现在把它说清楚了。因为我是说真的，你写得真好，我有种感觉我们会成功的。实话跟你说，鲍勃，这周晚些时候我会再联系你的，好吗？”

我记得我是多么鄙视自己，因为我竟没有勇气说声别麻烦了，我只是在向门口走去时，甩掉他慈爱地搂着我脖子的沉重的手。在过道里，又一次面对那个年轻号手，我突然有种不安的想法，我可以预见到接下来我们要说些什么。我会说，“伯尼，你以前在军队里真是号手吗？还是只为了拍那张照？”

而他则不会有丝毫羞愧，单纯的笑容里也不会有一丝变化，他会说，“只是为了照张相而已。”

更糟的是：我知道头戴宽檐帽的号手会转过身，照片里精神抖擞的形象会慢慢松垮下来，从小号口上扭过脸去，那无声的，没有才华的两片嘴唇从来屁都吹不出一个，我知道它会装作没看见我。所以我没有冒这个险。我只说，“再见，伯尼，”然后我就离开那该死的地方，回家了。

琼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出奇地平和。我不是说她在这事上对我“很体贴”，如果是那样的话，在那晚那种心情下几乎能杀死我；我意思是主要是她对伯尼宽容得多。

贫穷、失落、勇敢的小男人，做着黄粱美梦——那种事。我能想象得出这些年他花了多少钱吗？有多少辛苦赚来的钱可怜就这样掉进了二流、三流甚至十流作家的无底洞里去了？他又多么幸运，用一张自己伪造的作废支票，终于钓到了个一流作家。多么感人，多么“甜蜜”啊，他说“我要直接付你现金”时，已经知道我与那些作家的差别了。

“好了，看在上帝份上，”我对她说，谢天谢地，总算有一次我比她想问题更实际。“看在上帝份上，你知道他为什么给我现金吗？你知道吗？因为他打算下个礼拜就把这个故事卖给该死的《读者文摘》，卖十五万美元，因为如果我有支票的复印件，就可以证明是我写的，他就有麻烦了，这就是为什么他直接付我现金。”

“你愿意打赌吗？”她看着我问道，既同情我又为我自豪的表情真是可爱而难忘。“你愿意打赌如果他把这篇小说卖给《读者文摘》或什么地方，他还会坚持付你一半吗？”

“是鲍勃·普林提斯吗？”三天后，电话里传来愉快的声音。“我是伯尼·西维尔。鲍勃，我刚从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家回来。我不想告诉你他跟我都说了什么，但我要告诉你，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认为你棒极了。”

无论我对此如何回答——“他真的这样说吗？”或者“你是说他真的喜欢那故事？”——都有点不好意思，也能够立即把琼吸引到我身边来，我现在还记得她一脸笑容，扯着我的衬衣袖子，好像在说，看吧——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我只好把她推到一边，摇着手让她安静点，我好继续跟伯尼说话。

“他想把这篇小说给他在出版界的几个朋友看看，”伯尼说，“他还

想让我再印一份寄给西海岸的曼莱。所以听着，鲍勃，我们一边等着看这篇小说能怎么样，同时我还想再给你几篇作业。或者等等——听着。”新想法让他的嗓音浑厚低沉。“听着，也许你自己写会更舒服。你愿不愿意那样做？你愿不愿意跳过这些卡片，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雨夜，曼哈顿上西区，两个混混钻进了伯尼的出租车。粗眼瞧上去，他们可能跟普通乘客没什么两样，但伯尼一下就看出来，因为“拿我来说，在曼哈顿的街道上开了二十二年出租车，多少有一手”。

当然，两人中一个是典型的惯犯，另一个是有点受惊的男孩，可以说“只是个小阿飞。”

“我不喜欢他们说话的方式，”伯尼通过我告诉他的读者，“我不喜欢他们给我的地址——曼哈顿最低级的夜总会——最糟糕的是，我不喜欢他们坐我的出租车。”

那么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噢，别着急，他没有停车，没有绕过去，没有把他们从车后座拖出来，没有挨个朝他们胯下踢去——根本没有《载客中》里的胡说八道。首先，从他们的对话中看出他们并不是在逃亡；至少不是在今晚。今晚他们去那个下等小酒馆踩点（就是他们上车那里靠街角的小酒店）；明晚十一点才动手。不管怎样，当他们到那个夜总会时，惯犯给小阿飞一些钱，“给，伙计；你就坐这辆车回家，好好睡一觉。明天见。”就在那当口，伯尼知道他得行动了。

“那个小阿飞住在皇后区附近，这让我们有充足的时间谈话，所以我问他喜欢国家棒球联盟（注：National League，美国职业棒球组织之一，简称国联(NL)，成立于1876年。）冠军队中的哪个球员。”从那时开始，伯尼运用代代相传的道理和完美沟通技巧，一直和那个男孩谈着健康、干净的生活，充满阳光、牛奶的话题，还没到皇后区大桥时，他已开始把那男孩从犯罪深渊里拖出来。他们在皇后大道上疾驰，好似一对热衷于警察体育联盟（注：Police Athletic League，专为孩子们办的体育活动中心，其缩写为PAL，有好伙伴之意。）的人在喋喋不休，到达目的地时，伯尼的乘客已泪流满面了。

“我看到他付钱的时候，咽了几口唾沫”，这是我为伯尼加上的说话方式，“我能感觉到这孩子身上有什么变了。我对此抱有希望，不管怎样，也许只是个心愿罢了。我知道我为他做了所有我能做的。”回到市里，伯尼打电话给警察局，建议他们第二天晚上在那个下等小酒馆附近安排

几个人。

千真万确，确实有人试图抢劫那家小酒店，只不过被两个可爱的小警察给挫败了。也是千真万确，只有一个混混被抓进监狱——就是那个惯犯。“我不知道那晚那个男孩去哪里了，”伯尼最后说，“但我情愿相信他在家，躺在床上，喝着牛奶，读体育专栏。”

这里有屋顶，上面有烟囱；有窗户，光线照得进来；这又是一篇让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哈哈大笑的文章，又一篇可以向《读者文摘》投稿的文章；又一次机会的暗示：可以和西蒙舒斯特公司（注：Simon & Schuster, INC。1924年成立的一家大型出版机构。）签订出版合同，由威德·曼莱主演的三百万美元制作成本的电影。还有寄给我的又一个五美元。

一天，在五十九街与第三大道交汇处，一位虚弱的小个子老绅士坐在出租车里哭了起来，伯尼说，“先生，我能为您做什么吗？”接着我花了两页半纸写了我所能想象出来的最让人心碎、最不幸的故事。他是个鳏夫；唯一的女儿很久前就嫁了人并搬到密歇根州的弗林特去了；他过了二十二年的孤独痛苦生活，可他都勇敢地活过来了，因为他有一份他热爱的工作——在一家大型商业花房里照料天竺葵。可是这个上午，管理人员通知他，他必须走人：他太老了，不适合这种工作了。

“只在那时，”根据伯尼·西维尔所说，“我才将他所说的一切与他给我的地址联系起来——布鲁克林大桥靠曼哈顿侧的一个僻静处。”

当然，伯尼不太肯定，他的乘客是不是准备蹒跚着走到大桥中央，抬起那把老骨头，越过大桥栏杆一了百了；但他可不敢冒险。“我想这时我该说点什么”（对此伯尼的感觉是对的：若此处老人索然无味的哭诉再花去大半页纸，这个故事从地基处就会脱节断裂）。接下来是轻松活泼的一页，有一半的对话都是伯尼小心翼翼地问老人，为什么他不去密歇根跟女儿住在一起，或者至少可以给她写封信，这样她会邀请他过去住的；但是，噢，不，他只是一门心思不想成为女儿一家的负担。

“负担？”我说，说话的神态仿佛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似的。“负担？像您这样和蔼的绅士怎么可能成为任何人的负担？”

“可是我还能做什么呢？我能给他们什么呢？”

“当他这样问我时，幸好我们停在那里等红灯，所以我转过身来，直盯着他的眼睛。‘先生，’我说，‘难道您不觉得家里有人多少懂点天竺葵的栽培也不错吗?’”

好了，当他们到达大桥时，老人已决定在自动售货机处下车，因为他说想喝杯茶，该死的砌墙就到此为止了。屋顶是这样的：六个月后，伯尼收到一个小小的，但很重的包裹，上面盖着密歇根州弗林特的邮戳，收信地址是他所在出租车车队。你知道那包裹里是什么吗？你当然知道。天竺葵盆栽。这里还有烟囱：里面还有张便条，老人隽朗的笔迹在上面简单写着，“谢谢你。”我在故事里也是这么描述的。

从我个人来说，我挺讨厌这一篇，琼对它也没把握；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寄出去了，伯尼很爱这个故事。而且，他在电话里说，他妻子罗丝也喜欢这故事。

“鲍勃，我想起来，我打电话还有一件事；罗丝要我问问你，晚上你和你太太能不能到我家来小聚一下。没什么特别的，只有我们四个，喝点东西，聊聊天而已。你们愿意来吗？”

“哦，你们真是太好了，伯尼，我们当然愿意。只不过太突然了，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安排——等等。”我捂住话筒，与琼紧急商量了一下，希望她给我提供个说得过去的借口。

可是她想去，她想当晚就去，所以我们四人就凑在一起了。

“哦，好啊，”当我挂上电话，她说道。“我很高兴我们要去。他们听上去真是好人。”

“好了，你看。”我用食指指着她的脸。“如果你打算坐在那里，让他们都觉得自己在做‘好人’，那我们就不去了。我可不想花什么晚上的时间充当慷慨大方的女慈善家的丈夫，坐在低等人中间，就这么说好了。如果你想把这事变成什么本宁顿姑娘们为仆人们准备的花园派对，你还是立即忘了这事吧。你听到了吗？”

接着，她问我想不想知道一件事，不等我说想不想，她就告诉我了。她对我说，我是她这一生中遇到过的最大的势利鬼、最大的恶棍、最彻头彻尾、大嗓门的怪物。

一事接一事;我们坐地铁去与西尔维夫妇小聚时，我们俩几乎没有任何交谈。我无法告诉你后来我发现西尔维夫妇自己喝姜汁汽水，却为他们的客人准备了一瓶黑麦威士忌时，我有多么感激。

伯尼的妻子是个风风火火的女人，穿着细高跟鞋，束着腰带，头上别着发卡，她那电话公司接线员的标准声音优雅得体，但却冷冰冰的(“你好，真高兴认识你们;请进;请坐;伯尼，帮帮她，她的外套脱不下来”);天知道是谁开的头，也不知道为什么，但那晚上从让人不快的政治讨论开始。琼和我对杜鲁门、华莱士的意见不一，所以那年我们压根就没投票;西尔维夫妇都是杜威(注：约翰·杜威(John Dewey, 1859—1952)，美国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功能心理学的先驱，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代表。)的信徒。更糟的是，由于从感情上说我俩是温和的自由派，罗丝为了寻找共同点，特意说了好几个悲惨故事，每个故事都是关于布朗克斯区有色人种、波多黎各人残忍而凶狠的侵犯，都有刻意描绘的令人不寒而栗之处。

但没过多久情况就好转了。首先他们都很喜欢琼——我得承认我还没遇到过谁不喜欢她的——其次，过了片刻话题就转到他们认识威德·曼莱这不可思议的事上来。这又引起了一系列骄傲的回忆。“伯尼从没从他那里拿过什么，可是别担心，”罗丝向我们保证。“伯尼，告诉他们那次他在这里，你要他坐下，闭嘴，你是怎么做的。他真的那样做了!真的!他就那样朝他胸口推了一把——朝这个电影明星!他说，‘啊，给我坐下，闭嘴，曼莱。我们知道你是谁!’告诉他们呀，伯尼。”

伯尼呢，快活得直不起腰来，站起来重演那场景。“噢，你知道，我们就坐在那里说笑着，”他说，“但不管怎样，我真那样做了。我就像那样推了他一把，我说，‘啊，给我坐下，闭嘴，曼莱。我们知道你是谁!’”

“他做了!老天知道!把他推到那边那把椅子上!威德·曼莱!”

没多久，我和伯尼坐到一起，饮料让我们精神振奋，开始了男人间的聊天。罗丝和琼则舒服地窝在双人沙发上，罗丝狡狴地看着我。“我不想让你丈夫自我膨胀，琼妮，但你知道科罗夫博士跟伯尼说什么吗?伯尼，我能告诉她吗?”

“当然，告诉她!告诉她!”伯尼一手挥着姜汁酒瓶，另一只手抓着威士忌酒瓶，意思是今晚一切秘密都可公之于众。

“好吧，”她说。“科罗夫博士说你丈夫是伯尼遇到的最棒的作家。”

后来，我和伯尼挪到双人沙发上，女士们到壁橱那边去了，我开始意识到罗丝也是个建筑工人。也许她没有亲手建这个壁橱，可买这个几百美元的壁橱得分期付款，在内心说服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显然比自己亲手做一个还多。那样的家具可是对未来的投资；现在，她一边跟琼说话，一边小心抚弄它，这里擦擦那里抹抹。我敢发誓，我知道她脑子里正在琢磨以后的一场聚会。不用说琼和我也会置身其中，（“这是罗伯特·普林提斯先生，我丈夫的助手，普林提斯先生”），其余客人的名单也可以提前确定：威德·曼莱和他妻子，当然，还有他们精心挑选的好莱坞朋友；沃特·温彻尔也会在那里，还有厄尔·威尔逊和图茨·绍尔及他们那群人；但更重要的是，还有那些雅士们，如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夫妇，以及他们这圈子里某些人也可能会出席。像莱昂内尔·特里林们、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们、亨丁顿·哈特福们和莱斯里·R·格罗夫斯们那样的人——如果纽博尔德·莫里斯先生夫人那样的人想来，你可以想得到他们为了获得邀请得玩多少花招。

琼后来也承认那天晚上西尔维家里有点闷热；我现在说这个是为我自己后来做的事找个像样的借口——1948年时我很容易喝醉，现在好多了，相信我——我喝得酩酊大醉。不久我不但是唯一的那个大吼大叫的人，而且也是房间内唯一说话的人；看在老天份上，那时我正在给他们解释说我们四个都是百万富翁。

难道我们没有跳舞吗？噢，我们一直把莱昂内尔·特里林打得团团转，把他推到房间里的每一把椅子上——“还有你，莱因霍尔德·尼布尔，你这狂妄、伪善的老傻瓜！你的钱到哪去了？为什么不拿点出来看看？”

伯尼咯咯直笑，看上去有点瞌睡了，琼因为我感到十分难堪，罗丝在一旁冷冷笑着，绝对理解丈夫们有时会有多烦人。我们站在过道上，每人至少往身上套了半打衣服，我又看到那张号手照片，心里想自己敢不敢把那烫手的问题提出来。可是这次我不敢肯定哪个答案让我更害怕：伯尼可能说，“就是照张相而已，”他也可能会说，“那当然是我！”然后走到衣橱或壁橱那里，翻腾一阵，找出那把生锈的军号，我们四个只能又走回去坐下，伯尼并拢双脚脚跟，绷直身体，为我们吹出纯洁忧伤的音乐。

那时是十月。我记不清那年秋天到底写了多少篇署名“作者伯尼·西

维尔”的故事。我记得写过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故事。有位胖胖的乘客，想更好地看街景风光，从出租车的天窗里探出身子，结果腰给卡住了。还有个很严肃的故事，伯尼就种族宽容长篇阔论了一番(我一想起在布朗克斯区棕色人种数量增加这个问题上他与罗丝总是夫唱妇随，多少有点酸溜溜的);我记得那段日子，只要提到他，我和琼就会吵嘴。

比如，琼说我们真的应该回请一下他们，我对她说别犯傻了。我说我敢打赌他们不会指望我们回请的，她问“为什么?”，我干脆不耐烦地简单说，我们之间层次上的差别无法逾越，假装西维尔夫妇能真正成为我们的朋友，或假装他们真的想与我们交朋友都是徒劳。

还有一次，一个无聊之极的傍晚，我们去婚前最喜爱的餐馆吃饭，几乎有一个小时我们竟找不到可说的话题，琼努力想让对话继续下去，于是举起葡萄酒杯，十分浪漫地隔着餐桌靠向我。“为伯尼这次把你的小说卖给《读者文摘》干杯。”

“是啊，”我说。“没错，这可是件大买卖。”

“噢，别那么粗鲁。你明知道总有一天会成真的。我们就会挣上一大笔钱，去欧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开什么玩笑?”她的话突然让我很恼火，任何一个二十世纪受过良好教育的聪慧姑娘怎能如此容易上当受骗，这样一个女孩竟然是我妻子，我竟然同这种头脑简单、无知的人生活了这么多年，还将继续生活下去，这情形，在那一刻似乎有点难以接受。“你怎么就不能长大一点呢?你不会真的以为他有机会卖掉那堆垃圾吧，你会吗?”我看她的眼神一定与那晚上伯尼看我的眼神有点像，那晚上他问我不会真的以为是二十五美元一次吧。他也说“你会吗”?

“是的，我会，”她说，把手里酒杯放下。“至少，我相信。我以为你也相信。不然，继续为他干活不是有点可笑、有点虚伪吗，是不是?”回家的路上她没有再同我说话。

我想，真正的麻烦在于我们那时被两件更为严肃的事纠缠住了。一是我们刚刚发现琼怀孕了，另一件事是我在合众国际的工作像偿债基金债券一样岌岌可危。

我在财经新闻科上班成了缓慢的折磨，等着上司慢慢发现原来我对

自己从事的工作一无所知;无论现在我如何可怜地想要学习本应掌握的知识,现在再虚心求教也晚得太可笑了。我整天弓着腰趴在咔嗒作响的打字机上,腰弯得越来越低,因担心被炒而冷汗直流——助理财经主编的手和蔼而伤感地搭在我肩上(“我能跟你简单谈几句吗,鲍勃?”)——每天这事儿没发生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可卑的胜利。

十二月初的一天,我从地铁出来往家走,像个七十岁的老头拖着自己的身子朝西十二街走下去。我发现一辆出租车像蜗牛般地在我身边慢慢爬行,跟着我走了一个街区。这是辆绿白相间的车,挡风玻璃后我看到一张巨大的笑脸。

“鲍勃!怎么回事,鲍勃?看你失魂落魄的,你住这儿吗?”

他把车停在路边,走出来,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他穿工作服的样子:一顶棒球长舌帽,开胸套头衫,腰上挂着个圆筒零钱包;我们握手时,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指尖因白天黑夜地收钱找钱变得灰亮灰亮的。走近看,不管他笑不笑,看上去跟我一样疲惫不堪。

“请进,伯尼。”看到破破烂烂、门口肮脏的楼道,刷着白灰、贴着海报的墙壁,简陋的大单间,租金可能还不及他和罗丝在非中心区房屋租金的一半,这让他有点吃惊。我记得让他发现我家如此简陋反而令我有种波希米亚式的骄傲;我猜我有种自命不凡的想法,这不会伤害到伯尼,却能让他明白人们会贫穷与聪明兼而有之。

我们可没能力为他端上姜汁汽水,他说一杯白水就好,因此这算不上什么正式的社交场合。后来让我不安的是,我记得他和琼之间是多么拘谨——我觉得整个拜访期间他都没正眼看过琼——我在想也许是因为我们没有回请他们。有些事大家总觉得不该是丈夫的错,但如果真是丈夫错了,妻子十有八九要背黑锅,这是为什么呢?也许伯尼只是觉得穿着出租车司机的制服出现在她面前很不好意思,在我面前还好一点。也许他从来没想到这样一个美丽、有教养的姑娘会住在如此凄惨的环境里,因而局促不安。

“我告诉你我今天来你这干什么,鲍勃。我想尝试新角度。”他说话时,我从他眼睛而不是话语里,看到我们这个长期建筑计划可能出了什么大问题。也许科罗夫博士出版界的朋友最终说了实话,我们那些可怜故事的出版希望渺茫;也许科罗夫博士自己变得脾气暴躁;也许从威德·曼莱那里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或者更令人受打击的是从威德·曼莱的经

纪人那里传来的消息。或者仅仅是伯尼自己每天在那般劳累后一杯白水根本解不了乏，他十分疲劳，不管怎样，他想换个新角度。

我可曾听说过文森特·J·波勒第？不过他说这个名字时好像很有把握。我不会大吃一惊，他立即就告诉我以下信息：文森特·J·波勒第是来自伯尼自己所住的布朗克斯区的州民主党议员。

“这个人，”他说，“是个不辞辛苦帮助别人的人。相信我，鲍勃，他可不是你那些低级竞选人。他是真正的人民公仆。而且，他新加入民主党，打算竞选下一届国会议员。我的想法是这样的，鲍勃。我们来拍张我的照片——我有个朋友会无偿做这个的——我们从出租车后座上拍，我手握方向盘扭过头来，脸带微笑的样子，像这样，明白吗？”他满脸笑容，转过身子，展示给我看照片应该像什么样子。“然后我们把这张相片印在小册子的封面上。标题就叫”——这时他手在空中比划着黑体字母——“小册子的标题就叫‘来自伯尼’，行不？好。在小册子里面我们有个故事——跟你写的那些故事没什么两样，只是有点小区别。这次我要讲个故事，说明为什么文森特·J·波勒第是我们需要的国会议员。我不是说一堆政治言论，鲍勃。我的意思是真实的小故事。”

第二章

“伯尼，我不明白这有什么用。你不能编个故事，来说明为什么有人是我们需要的国会议员。”

“谁说不能?”

“不管怎样，我以为你和罗丝都是共和党人。”

“从整个国家来说，我们是共和党人，但具体到地方上，我们不是。”

“好吧，见鬼，伯尼，我们刚搞完选举。两年内不会再有别的选举了。”

但是他只是拍拍他的头，做了个遥远的手势，意思是在政治上，人得有点远见。

琼在房间那头的厨房区域，洗早餐的碗碟，准备做晚饭，我望着她向她求救，但她转过身去。

“听上去不合适，伯尼。我对政治一窍不通。”

“那又怎么样?懂?这种东西，谁又懂?你懂开出租车吗?”

不懂;我也一点不懂什么华尔街——华尔街，什么鬼街!——但那是另一个让人沮丧的小故事。“我不知道，伯尼;现在一切都不确定。目前我还是什么活也不接的好。我是说我最近可能会——”但是我无法亲口说出我在合众国际社的工作有麻烦，我只好说，“首先琼有了孩子，每件事都——”

“哇!好啊，那不是太棒了吗!”他腾地站起来，握着我的手。“那——不是一太棒了!祝贺你，鲍勃，我想这是——我想这真是太美好了。祝贺你，琼妮!”我那时觉得这种反应有点过头了，不过也许这种消息很容易打动人到中年膝下无子的男人。

“噢，听着，鲍勃，”当我们重新坐下时，他说。“这个波勒第的事情对你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我告诉你吧。既然这事只有一次，也不会

有什么版权，我们就不是五块而是十块钱。这买卖怎么样?”

“好吧，但是等等，伯尼。我要更多的材料。我意思是这家伙为人们做了些什么好事?”

我马上就看出来，原来伯尼对波勒第的了解也不会比我多多少。他是个真正的人民公仆，仅此而已;他牺牲自己帮助别人。“噢，鲍勃，听着。这有什么不同?你的想象力跑哪去了?以前你从不需要什么帮助。听着。你只是告诉我，马上给我一个主题。我一直在开车;在妇产科医院门前，两个家伙朝我挥手，年轻的退伍军人和他的妻子。他们的小鸡仔刚刚出生，才三天大，他们快活得像云雀。唯一的麻烦在于，这个小伙子没有工作，什么都没有。他们刚搬到这里，什么人也不认识，也许他们是波多黎各人或其他什么人。他们的房子只租了一个礼拜，就这样。他们身无分文。所以我带他们回家，他们就住在我家附近，我们一路聊天，我说，‘听着，伙计们。我想带你们去见我的一个朋友。’”

“文森特·J·波勒第议员。”

“当然。只是我没告诉他们他的名字。我只是说‘我的一个朋友’。当我们到他那里，我走进去，告诉波勒第这事情，他走出来，跟他们聊了几句，给了他们点钱什么的。明白吗?我刚才差不多说了你故事的一大部分了。”

“嘿，等一等，伯尼。”我站起来，夸张地在房间里踱着步，这是好莱坞电影里人们开会时才有的样子。“等一会。在他给他们钱后，他钻进你的出租车，你把他载到大广场车站，那两个波多黎各人站在街边，对望着，那个姑娘说，‘刚才那个男人是谁?’小伙子看上去很严肃，他说，‘亲爱的，难道你不知道?难道你没发现他带着面具吗?’她说，‘哦，不，不可能是那个——’而他说，‘是的，是的，就是他。亲爱的，就是那个独立国会议员。’听着!你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吗?听着!他们听到街区那边传来这个声音，你知道那声音在喊什么吗?”我单膝哆嗦着跪地，抖出了这个故事的包袱，“那声音在喊着‘嘿，你，伯尼·西维尔——滚开!’”

写出来似乎不太好笑，但那时几乎把我笑死了。我哈哈大笑了至少一分钟，直笑得我剧烈咳嗽，琼只好过来帮我拍背;我慢慢缓过来后，才发现伯尼根本没笑。在我这通发作中，他一脸茫然，礼貌性地打了几个哈哈。这时他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本来镇静的脸羞得红一块白一块。

我伤害了他的感情。我记得我恨他如此容易受伤害，我恨琼又走回厨房，不帮我摆脱这尴尬局面，我也记得我开始觉得很内疚很抱歉了，好长时间房间里死一般寂静，最后我决定接受这份活，这是唯一体面的出路。果然，在我告诉他我决定试试时，他马上高兴起来。

“我是说你不一定得用这个波多黎各人的故事，”他让我放心。“那只是一个想法而已。或者你可按那种方式开头，再写点别的事情，越多越好。你自己喜欢的方式写出来就行。”

站在门口，又是握手(我们好像整个下午都在握手)，我说，“就是说，这个故事十元，对吗，伯尼？”

“对，鲍勃。”

“你真的觉得你该告诉他你会这么做吗？”他刚走琼就问我。

“为什么不？”

“好吧，因为实际上已经不可能了，不是吗？”

“瞧，能不能行行好，别再啰里啰嗦？”

她两手叉腰。“我搞不懂你，鲍勃。你为什么说你会写这个故事。”

“你为什么这么想？因为我们需要那十块钱，这就是为什么。”

最后我建造了——噢，建造，所谓的建造。我花了一页、两页、三页写这架老机器，我写这个狗娘养的。我确实是从那几个波多黎各人开始的，但不知为什么我用不了几页就搞定了他们；然后我只好为文森特·J·波勒第找其他法子来证明他无与伦比的善良。

当一个公务员真的想尽各种法子帮助人们时，他会怎么做呢？给他们钱，他就是那样做的；不久我笔下的波勒第给出去很多钱，多得他都数不清了。现在情况成了这样：在布朗克斯区，不管是谁，只要有点拮据，他只要钻进伯尼·西维尔的出租车，说一句，“去波勒第家，”他们的麻烦就解决了。最糟糕的是我无情地确信，我尽我所能地写了。

琼没有看这篇文章，我写完时她已睡了，我直接把它塞进信封，寄了出去。大约有一周时间——伯尼那边没有传来片言只语——或者说在

我们两人之间没有任何消息。接着，和他上次来访的时间一样，在一个烦躁劳累的傍晚，我家的门铃响了。我打开门，看见他笑着站在门口，套头衫上洒着几点雨水，就知道麻烦来了。我知道我可没打算听任何废话。

“鲍勃，”他说着坐下来，“我讨厌这么说，但这次我对你很失望。”他从衣服里抽出卷起来的那份手稿。“这东西——鲍勃，这什么都不是。”

“它有六页半。那可不是什么都不是，伯尼。”

“鲍勃，请不要给我六页半纸。我知道这里有六页半，但它什么都不是。你把这人写成了傻瓜，鲍勃。你让他一直不停地给钱给钱。”

“你告诉我他给钱的，伯尼。”

“关于那些波多黎各人，是我说的，没错，也许他可以给一点钱，好吧。可是你一路下来，你让他到处给钱，像个——像个醉醺醺的水手什么的。”

我以为我会哭出来，但我说话的声音来得很低沉，控制得非常好。“伯尼，我可是问过你他还能做些什么的。我可是告诉过你我不知道他妈的他还会做些什么。如果你还想他做点什么别的，你早该说清楚。”

“可是，鲍勃，”他说，为了强调，他站了起来，他接下来说的话，我后来回忆，好似腓力斯人(注：Philistine，中东古国人，现在多指俗气、庸俗、没文化的人。)最后绝望而永恒的哭泣。“鲍勃，你才是那个有想象力的人!”

我也站了起来，这样可以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我知道我才是那个有想象力的人。我也知道我才二十二岁，可疲惫得像个老头，我知道工作就快丢了，孩子就快出生了，与妻子的关系有点紧张;现在纽约市里的每个出租车司机、每个不值一提的政客们的掮客、假冒号手都可以走进我家，企图偷走我的钱。

“十块钱，伯尼。”

他笑着做了个无助的手势。接着他望向厨房，琼在那里，虽然我是想盯着他的，可我的眼睛一定也跟着他看过去了，因为我记得她在做什么。她在拧洗碗巾，眼睛直盯着它。

“听着，鲍勃，”他说。“我不该说它什么也不是。你是对的!谁能说这样一篇六页半长的东西什么也不是呢?也许这里面有许多好东西，鲍勃。你想要你的十块钱;好的，没问题，你会得到你的十块钱的。我的要求是，先把这篇东西拿回去，好好改改，就这样。然后我们可以——”

“十块钱，伯尼。现在就给。”

他的笑容一下子没了生气，在他从钱夹里抽钞票，递给我时，笑容还僵在脸上，而我还来了场痛苦的表演，我仔细检查这张十美元的钞票，看看他妈的是不是真的十美元。

“好吧，鲍勃，”他说。“那我们扯平了，对不?”

“没错。”

于是他走了，琼飞快地走到门边，开开门，大声叫道，“晚安，伯尼。”

我觉得我听到他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停了一下，但我没听到他的诸如“晚安”之类的任何回应，所以我猜他可能转过身，朝她挥挥手，或者给她一个飞吻。接着从窗口我看到他从人行道上移过，钻进出租车，开走了。这过程中，我一直摆弄着那张钞票，折叠、摊开，再折叠、再摊开，我觉得手里握着的是我这一生中最不想要的东西。

房间里很静，只有我们两个人走动的声音，厨房那块地方蒸汽弥漫、飘散着晚餐的迷人香味，我想我们两人都没胃口。“好了，”我说。“就那样。”

“真的有必要吗?”她询问道，“对他那样不友好?”

这时候，她的这句话，仿佛是她说过的话中最不忠诚的一句，最不体谅的一句。“对他不友好!对他不友好!如果你不介意，请告诉我，我他妈该怎么做?我是不是该“友好地”坐在这里，让某个低级撒谎的吸血鬼

般的出租车司机走进来，把我的血吸干?这就是你想要的?啊?这就是你想要的?!”

此时，她做了这种时刻常做的动作，有时候我想我情愿牺牲生命中的任何东西，也不要再看见这个动作：她转过身，背对着我，闭上眼睛，双手捂住耳朵。

这之后不到一周，助理财经编辑的手终于落在我的肩上，正好是我写到国内公司债券交投略微活跃这一段的中间。

离圣诞节还有一段时间时，我又找到一份工作，在第五大道的杂货店里当机械玩具的演示员，好歹可以让我们熬过一段日子。我觉得就是在杂货店的日子——给用锡和棉花做的小猫上好发条，小猫就会“喵!”的一声滚过去，“喵!”的一声又滚过来，“喵!”的一声滚过去——不管怎样，就是在那里的某个时候，我放弃了脑子里残留的一点要按欧内斯特·海明威的模式建造自己生活的想法。某种建筑计划已明明白白不可能了。

新年后，我找了几份白痴活干;接着，四月时，像春天总是突如其来，并给人带来惊喜一样，我被一家企业的公关部门聘为文案，薪水八十美元一周，在那里我在做些什么根本不重要，因为那儿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这份活相当轻松，每天我可以节省大量精力做自己的事，我的写作突然变得顺利起来。海明威确实已被我抛弃，我转到F·司考特·菲茨杰拉德模式上来;那么，最起码，我已开始寻找代表自己风格的东西。冬天过去了，我和琼之间的关系缓和了些，初夏我们的第一个女儿出生了。

她打乱了我一两个月的写作计划，但不久我又回到写作上，确信我越写越好：我开始推平土地，挖地基，为一篇雄心勃勃的悲剧长篇做好铺垫。我一直没有写完这本书——我现在想起来，它是我一系列未完成的小说中的第一部——但在早年那些岁月里，它是令我着魔的作品，进展缓慢似乎只是为了它写完后更加优秀。每天晚上我花在屏风后面写作的时间越来越多，只有在房间里踱步时才会露露面，踱步时满脑子都是宁静神圣的白日梦。那年年底，又是一个秋天到了。有天晚上，琼出去看电影，我在家里照顾孩子。电话响了，我从屏风后走出来，拿起电话，听到：“鲍勃·普林提斯吗?我是伯尼·西维尔。”

我不想假装我已忘了他是谁，可也并没能马上就想起我曾经为他工作过——我曾经卷入过一个出租车司机的可怜妄想里。我停了一下，就是说这让我略有迟疑，接着腼腆地张嘴朝着电话听筒笑了，我飞快地低下头，用没握听筒的那只手理了理头发，这是高度羞涩的表示——同时我心里默默地发誓，这次无论伯尼·西维尔想要我做什么，我一定不怕麻烦，尽量不伤害他的感情。我记得那时我多么希望琼也在家，这样她就看得见我对他有多和善。

但电话里首先询问的是宝宝。是男孩还是女孩?太好了!她长得像谁?哦，当然，自然啦，他们在这个阶段还看不太出像谁。当爸爸的感觉如何?啊哈?感觉很好?好极了!接着，他开始用异常正式，低沉的语调说，“您太太还好吗?”那感觉仿佛是解雇多年的仆人在询问这所房子的女主人。

在他的家里，她曾经是“琼”、“琼妮”和“甜心”，我怎么也不相信他已忘了琼的名字;唯一的猜想便是那晚他没听到她追出来向楼梯上的他道晚安——也许，他只记得她手里拿着洗碗巾站在那里的样子，可能埋怨她，认为是她怂恿我硬要那十美元的。但是我现在只能告诉他，她很好。“你们怎么样，伯尼?”

“嗯，”他说，“我还好，”说到这里，他的声音一下子变得异常严肃，像在病房里召开会议。“可就在几个月前，我差点失去了罗丝。”

噢，不过现在好了。他安慰我说，她现在好多了，也出院回家了，现在感觉还好;但当他开始谈起“化检”和“化疗”时，冥冥之中无法说出口的癌症浮现出来，我有种可怕的死亡之感。

“哦，伯尼，”我说，“她生病真是太让人难过了，请一定要向她转达我们的——”

转达什么呢?问候?祝愿?无论是哪一种，我突然觉得，都带有一种无法原谅的纡尊降贵的姿态。“转达我们的爱，”我说。可话刚出口，我便恐惧得咬到自己的舌头，我恐怕这听上去是最最居高临下的措辞了。

“我会的!我会的!我当然会转达的，鲍勃，”他说，所以我很高兴我那样说了。“噢，别担心，我不会谈政治。是这么回事。我现在找了一个真有才华的小伙子为我工作了，鲍勃。这个小伙子是个艺术家。”

我的天啊，作家的心是多么讨厌、多么复杂！你们知道当我听他这么说时心里做何感想吗？我感到一阵嫉妒刺痛。“艺术家？”他是吗？我要给他们看看在这个小小的写作事业上谁才是该死的艺术家。

可是伯尼马上又谈起了“草图”和“布局”，这样我才收回我那一争高下之心，原有的置身事外之感又占了上风，心里踏实好多，实在让人啼笑皆非。这真是一种解脱！

“哦，艺术家，你是说，他是个连环漫画艺术家。”

“是的。鲍勃，你该看看那小伙子画的画。你知道他怎么做的吗？他让我看起来跟我自己一模一样，可又有点像威德·曼莱。你看过这些连环画吗？”

“听上去很不错，伯尼。”现在这置身事外之感又来了，我看得出我得小心，防备着点。也许他不再需要什么故事——现在他可能有一整壁橱的草稿供艺术家创作——但他仍然需要一个作家“写对话和情节”，不管怎么说好，他需要一个作家把艺术家画的汽球对话框里的话填满，我只得尽量柔和、尽可能得体地告诉他，我不可能再干了。

“鲍勃，”他说，“这可是真正的建筑。科罗夫博士看了一次这些连环画，他对我说，‘伯尼，把杂志那事忘了吧，把书也忘了吧。你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

“嗯。听上去很不错，伯尼。”

“鲍勃，这便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原因。我知道你在合众国际的工作很忙，但我还想也许你可以花点时间做一些——”

“我没有在合众国际工作了，伯尼。”我告诉他现在的这份宣传工作。

“好啊，”他说。“听起来你真的飞黄腾达了，鲍勃。恭喜你。”

“谢谢。不管怎么说，伯尼，问题是我现在真没时间为你写东西了。我是说当然我很愿意，不是说不；只是因为宝宝占去了大部分时间，我还有自己的活要干——我现在正写一部小说，你知道——我真的觉得最好还是不再接别的活了。”

“噢。好吧，那么，鲍勃;别担心。我只是说，你知道，在这件事上如果我们用上你的——你明白，你的写作天分，我的意思是我们会大有突破。”

“我也很抱歉，伯尼，可我真的祝你好运。”

我发誓，你们可能到现在也猜不出他打电话的原因，我在跟他道别一个小时候后才突然想到：这次伯尼根本就没想让我帮他写东西。只是他以为我还在合众国际工作，因此以为我跟这个辛迪加连环画企业的核心部门关系密切，想利用我的这层关系。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我想到这个时我在做什么。我在给宝宝换尿布，我低头看着她圆圆美丽的眼睛，好像我盼望着她祝贺我，或感谢我，因为我又一次成功地做到没有让安全别针碰到她柔嫩的皮肤——我想起他说话时的方式时，正在给宝宝换尿布。他说“我们用得着你的——”时停顿了一下。

无论这个精心设计的建筑计划是否取决于“你在合众国际的关系”，话语停顿的当口，他一定放弃了这个建筑计划(他不知道我被解雇了;他以为我在报纸行业上还有稳固的关系，就像以为科罗夫博士在心理学领域或威德·曼莱在电影事业上一样)，他只好说“用得着你的写作才能”。我在电话里小心翼翼尽量不伤害伯尼的感情，其实，最后，是伯尼努力避免伤害到我。

老实说，这么多年来我很少想起他。如果告诉你们我每次坐进出租车里都要凑近去看看司机后脑勺和侧面，这倒是神来之笔，可这不是事实。但有件事是真的，只不过我才意识到，在我为写微妙的私人信件，绞尽脑汁想一个恰当措词时，我会想起：“今天我没时间给你写封短信，所以我还是给你写封长的吧。”

无论我在说祝他的连环画好运时是否真心，我觉得在那一小时后我是真心真意的了。现在我衷心祝他好运。好笑的是，不管有无关系，他可能还是能把这些建成个什么东西。在美国比这傻得多的想法都建成了庞大的商业王国。无论如何，我希望他没有对此丧失兴趣，采取什么形式都好;但我最希望的是，天啊——这次我不是发誓——我希望，不论老天爷什么样，千万别让他失去罗丝。

全部读完这篇文章后，我明白它建得还不好。它的横梁与托架、它

的墙体有点不均衡，需要修缮，感觉地基有点脆弱，可能一开始我就没能挖出正确的坑。但现在担心这些也没用了，因为是时候给它封顶了——向你们交待其他建筑工人的情况。

所有人都知道威德·曼莱后来怎么样。几年后他意外死在床上，死于一个并非他妻子的年轻女人的床上，这事足够刺激，够小报们忙上好几周的。你也能在电视上看到他演的老电影，每次看到这样的电影，我都会吃惊，他是个好演员——太出色了，我猜，正因如此他无法扮演一个不谙世事，心胸开阔的出租车司机这样的角色。

至于科罗夫博士，有段时间人人也都知道他在干什么。那正好是在五十年代初期，每家电视台都建立并开展了大规模的广告战役。其中引人注目的是一条声明，标明为、著名的儿童心理学家亚历山大·科罗夫博士所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家里没有电视机的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情感缺失。所有其他儿童心理学家、所有能言善变的自由主义者、几乎所有的美国父母都对他口诛笔伐，当他们批完以后，他就再也没有什么名气可言了。从那时起，我可以说，随便哪一周《纽约时报》为了一个纽博尔德·莫里斯能给你六个亚历山大·科罗夫。

接着该讲讲我和琼的故事，这是我给你们的烟囱。我只得告诉你们她和我所建的东西倒塌了，早在几年前就塌了。噢，我们现在还是好朋友——不会再有抚养费、监护权的法律之争，或那之类的事情——就到这里。

那窗户在哪？光线从哪里进来？

伯尼，老朋友，原谅我吧，我还没找到答案。我不敢肯定这间房子有没有窗户。也许光线打算从建筑工人马虎粗糙的手艺留下的那些缝隙、裂缝中钻进来，如果是这样，你们可以肯定没人比我感觉更糟的了。老天爷知道，伯尼；老天爷知道，这儿总有个什么地方会有窗户的，一扇我们大家的窗户。

万事如意

没人会让格蕾丝在婚礼前最后一个周五还工作。事实上，不管她想不想，都没人让她干活了。

打字机旁的玻璃纸盒里摆着一朵白色梔子礼花，这是老板阿特伍德

先生送的礼物，连同礼花一起还有个信封，里面卷着一张十美元的布鲁明戴尔商场(注：布鲁明戴尔商场(Bloomingdale's)，纽约著名的百货商场。)的购物礼券。自打那次在事务所圣诞派对上她热吻阿特伍德先生后，他总是待她彬彬有礼。格蕾丝进他办公室表示感谢时，他弓着腰，弄得桌子抽屉咔嗒直响，满脸通红，几乎不敢看她的眼睛。

“啊，这没什么，格蕾丝，”他说。“这是我的荣幸。给，你需要根别针把那玩意儿戴上吧？”

“它配有胸针，”她举起那朵花，说：“看到了吗？是很漂亮的白色胸针。”

他愉快地看着格蕾丝将花高高地别在衣领上，然后重重地清了清嗓子，将桌子下的写字板拖出来，准备交待她今天上午的工作，只口授了两封短信让她打印出来。不过一小时后，格蕾丝看到他在一叠录音带交给打字中心，才明白他关照了她。

“你真好，阿特伍德先生。”她说，“可我觉得今天你有活还是该派给我干，就像平时——”

“啊，格蕾丝，”他说。“结婚可只有一次。”

姑娘们挤在她桌旁，叽叽喳喳，笑成一团，一次次要看拉尔夫的照片(“喔，他真可爱!”)，办公室里闹轰轰的。办公室经理站在旁边，十分紧张，不太想扫她们的兴，但还是提醒说，毕竟，今天还是工作日。

吃午饭时，希拉夫特事务所开了个传统的小派对——九个已婚未婚的女人，平时很少喝的鸡尾酒让她们晕晕乎乎的，她们讲述从前时光，争着向她表达美好的愿望，也不管大家的皇家鸡饭(注：皇家鸡饭(chicken a la king)，一道法国菜。)都凉了。还有许多鲜花和一件礼物——银质果盘，这是姑娘们私下里凑钱买的。

格蕾丝不停地说：“谢谢你们”、“我太感激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直说得头脑里不停回响着这些话，直笑得嘴角生疼，她觉得这个下午好像永远不会结束。

拉尔夫大约四点钟时打电话过来，听上去兴高采烈的。“你在做什么，宝贝？”他问，还没等她回答，他又说，“听着，猜猜我得了什么？”

"我不知道。是礼物还是什么?什么东西?"她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很兴奋，但这还真不容易。

"奖金。五十块钱。"她好像能看到他说"五十块"时那扁扁的嘴唇，那份认真劲只有在他说钱的数目时才可一见。

"哦，好好啊，拉尔夫，"她说。如果她的语调里有一丝倦意的话，他也没察觉到。

"好好啊，是不是?"他笑着说，学着姑娘们说这个词的腔调。"你喜欢吗，啊，格蕾西(注：格蕾西，Gracie，格蕾丝的昵称。)?不，但我是说我真的很意外，你知道吗?老板说，'给你，拉尔夫，'他递给我这个信封。脸上毫无表情，甚至都没有一丝笑容。我想，怎么回事?我被解雇了?还是出了什么别的事?他说，'拉尔夫，快打开看看。'我就打开了，我再看老板时，他笑得嘴咧得有一里宽，"他轻声笑了，叹了口气。"好吧，听着，宝贝。你要我今晚什么时候过来?"

"喔，我不知道。尽早吧，我想。"

"好，听着，我得去埃迪家拿他借给我的旅行包，所以我可能会这样：先去他那里，接着回家吃饭，然后大概八点半或九点去你那里。行吗?"

"好啊，"她说。"到时见，亲爱的。"她叫他"亲爱的"没有多久，在决定要嫁给他后才开始这样称呼他，这个词听上去还那么陌生。当她清理桌上的一堆文具时(她实在无事可做)，一阵常见的痛苦袭来：她不能嫁给他——她根本不了解他。有时候，她又觉得，她不能嫁给他正是因为太了解他。不管哪种情况，都让她拿不定主意，想当初室友玛莎说的什么都能影响她。

"他真好笑，"玛莎在他们第一次约会后说。"他说'卫星间。'我不知道真有人会说'卫星间。'"格蕾丝咯咯笑了，觉得这确实很好笑。那段时间她觉得玛莎事事都对——事实上，当时在《纽约时报》的广告栏中找到玛莎这样的女孩合租，对她来说似乎真是最幸运的了。

但拉尔夫整个夏天都锲而不舍，到秋天时，她开始站在他一边了。"为什么你不喜欢他，玛莎?他真的很好。"

“噢，每个人都很好，格蕾丝，”玛莎用她的学院派腔调说，这种腔调可以让荒唐的事听起来很合理，她正在小心翼翼涂指甲油，这时她抬起头，目光离开涂得很漂亮的手指，“他就是那种有点——有点像条白虫。你懂吗？”

“我不懂这跟他的脸色有什么关系——”

“噢，天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吧，难道你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吗？噢，他的那些朋友，他的埃迪，他的马梯还有他的乔治，以及他们那种小气、穷酸的职员生活，他们那种小气、穷酸的……他们都一个德性，那些人。他们就会说‘咳，你的巨人队怎么样了？’或者‘嗨，你的扬基队呢？’他们全都住在城外很远的桑尼塞德或伍德海文或其他某个脏乱差的地方，母亲们都在壁炉架上摆着些该死的陶瓷小象。”玛莎说完又皱着眉头刷她的指甲去了，明确表示本次谈话结束。

整个秋天和冬天她都很迷茫。有一阵子，她试着只跟玛莎说的那种男人出去约会——那种男人总是用“有趣”这样的字眼，总穿着制服一样的窄肩法兰绒外套；有一阵子，她什么约会也不去。她甚至在事务所圣诞派对上对阿特伍德先生做出那样疯狂的举动。而拉尔夫一直在给她打电话，在她住所附近徘徊，等待她做决定。有一次她带他回了宾夕法尼亚的家(她从不敢想象带玛莎去的情形)，见了父母，但直到复活节她才最终屈服。

皇后区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经常组织大型舞会，拉尔夫那帮人常去，那次他们也去了。当乐队奏响《复活节游行》的乐曲时，他紧紧地拥着她，几乎让她动弹不得，还在她耳边轻声哼着旋律。她从来没想到拉尔夫会有这种举动——这么甜蜜温柔——很可能那会儿她并没有决定嫁给他，但至少是从那以后她才开始想这个问题的。那一刻格蕾丝摇曳在他沙哑的哼唱里，歌声穿过她的头发，仿佛就是在那一刻她决定以身相许：

“我是这么幸运

当他们打量着你

我是复活节游行队伍中

最骄傲的人……”

那个晚上，她告诉了玛莎，现在她还清晰地记得玛莎脸上的表情。“噢，格蕾丝，你不是——你一定不是认真的。我是说，我觉得他不过是个笑话——你不会真的说你想——”

“闭嘴!你别说了，玛莎!”她哭了一晚上。到现在她还为这个恨玛莎;即使是现在，她两眼茫然瞪着办公室墙上那一排文件柜时，她有些反感但又担心：玛莎也许是对的。

姑娘们嘻嘻哈哈的笑声朝她袭来，她吃了一惊，看到两个女孩——艾琳和露丝——在打字机那边张着嘴笑，还指了指她。“我们看见你了!”艾琳唱道。“我们看见你了!又出神了，啊，格蕾丝?”露丝还滑稽地模仿她出神的样子，挺起平平的胸部，眨眨眼，她们笑得前仰后合。

格蕾丝定了定神，重新恢复了单纯、开朗的新娘神态。现在要做的是想想接下来的安排。

明天早上，像她妈妈说的“大清早的”，她在中央火车站与拉尔夫会合，一起回家。他们大概一点钟能到，父母会在车站接他们。“见到你很高兴，拉尔夫!”爸爸会说，而妈妈可能会吻他。温馨而舒适的家庭气氛笼罩住她：他们不会叫他白虫;他们压根不会知道什么普林斯顿的男人、“有意思”的男人、玛莎神气活现说的任何其他类型的男人。爸爸可能会叫上拉尔夫出去喝啤酒，带拉尔夫参观他工作的造纸厂(而至少拉尔夫也不会瞧不起在造纸厂上班的人)，晚上，拉尔夫的家人和朋友会从纽约赶过来。

晚上她会有时间跟妈妈好好聊聊，第二天早上，“大清早的”(一想到妈妈淳朴、快乐的脸，格蕾丝眼睛一阵刺痛)，他们会穿上结婚礼服。接着去教堂举行仪式，然后是酒宴(爸爸会喝醉吗?穆里尔·克切会因为没当上伴娘而生气吗?)，最后，他们将坐火车去亚特兰大，住酒店。但从酒店开始，她就不能再做什么计划了。门在她背后关上，只留下一片狂野、奇异的寂静，全世界除了拉尔夫没有别人能为她指路了。

“好了，格蕾丝，”阿特伍德先生说，“我希望你永远幸福。”他站在她桌旁，已戴上帽子，穿好衣服，周围整理桌椅的声音说明五点钟了。

“谢谢你，阿特伍德先生。”她站起来，突然姑娘们全都围过来，她们争着向她道别。

“祝你好运，格蕾丝。”

“给我们寄张卡片，啊，格蕾丝？从亚特兰大哦。”

“再见，格蕾丝。”

“晚安，格蕾丝，听着：万事如意。”

最后，格蕾丝终于摆脱了她们，出了电梯，出了大厦，穿过人群，急急赶往地铁。

回到家，玛莎站在厨房门口，穿着一套素雅的新衣服，看上去很苗条。

“嗨，格蕾丝。我打赌她们今天几乎生吞了你，是不是？”

“噢，还好，”格蕾丝说。“每个人都——非常好。”她坐下来，筋疲力尽，把花、包起来的果盘扔在桌上。接着，她发现整个房间打扫擦拭过了，厨房里正做着饭。“唷，一切都好极了，”她叫道。“你为什么这样做？”

“噢，好了。我要早点回家，”玛莎说。她笑了，格蕾丝很少看到她像今天这般腼腆。“我只是想在拉尔夫过来时，让房间看上去像样点。”

“哦，”格蕾丝说，“你真是太好了。”

玛莎现在的样子有点让人吃惊：她看上去很不好意思，手上转动着一把油腻腻的锅铲，小心翼翼地与她的新衣服保持一定距离，还仔细盯着它看，好像有什么话，欲说还休的样子。“你看，格蕾丝，”她开口了。“你知道我为什么不能参加你的婚礼，对吧？”

“噢，当然。”格蕾丝说，实际上她不知道，一点都不知道。似乎是她得赶在哥哥参军之前，去哈佛见他一面，但从一开始听上去就像个谎言。

“我只是讨厌你觉得我——嗯，不管怎样，我很高兴你明白我为什么去不了。另外一件我想说的事更重要。”

“什么？”

“嗯，我对以前说拉尔夫的那些坏话感到很抱歉。我没有权利那样对你说话。他是个十分可爱的小伙子，我——嗯，我很抱歉，就这些。”

格蕾丝心中涌上一阵感激与欣慰，想掩饰都掩饰不住，她说，“喔，没什么，玛莎，我——”

“肉排烧糊了！”玛莎返身冲回厨房。“还好，”她叫道。“还可以吃。”当她出来摆好饭菜时，她又恢复了往日的沉静。“我得赶快吃，吃完就得跑。”她们坐下时她说。“我的火车四十分钟后开。”

“我以为你明天才走。”

“嗯，原打算明天的，”玛莎说，“但我决定今晚就走。因为你看，格蕾丝，还有件事——如果你能再接受一个道歉——我感到抱歉的是我从没给你和拉尔夫单独相处的机会。因此，今天晚上我打算消失。”她犹豫着说。“就把这当作我的结婚礼物吧，好吗？”她笑了，这次并不是害羞的笑，而是笑得更符合她的本性——眼睛在饱含深意的一眨之后微妙地移开了。格蕾丝在经历了怀疑、迷惑、敬畏，实际模仿种种阶段后，很久以前就将这种微笑与“老于世故”这个词联系在一起了。

“噢，你真是太可爱了，”格蕾丝说，但她并没明白玛莎所指为何。直到吃过饭，洗了碗，直到玛莎飞也似地化妆、拎着行李，飞快道别，去赶火车后，她才有点明白。

她放了一大缸水，意乱情迷地洗了个泡泡浴，又花很长时间擦干身体，还在镜子前摆出各种姿势，心中慢慢萌生出奇怪的兴奋。在卧室里，她在昂贵的白盒子内的薄纱堆中，从为结婚准备的衣衫中抽出最心爱的白色尼龙薄衫和配套吊带睡裙，穿上后，她又走到镜子前。她以前从没这样穿过，也从没有这样的感觉，想到待会儿拉尔夫将看到她这副打扮，她忍不住走到厨房喝了杯玛莎留着开鸡尾酒派对时用的干雪利酒。然后她把灯全关了，只留下一盏，端着杯子，走到沙发前，窝在沙发里等他来。过了会儿，她又站起来，把雪利酒瓶拿过来放到茶几上，还在那里摆了个托盘和一只杯子。

拉尔夫离开办公室时，隐隐觉得有点失望。不管怎么说，他对婚礼前的这个星期五还是充满期望。奖金支票还好(虽然他私底下希望奖金数额多一倍)，吃中饭时，办公室的小伙子们请他喝了瓶酒，开着有分

寸的玩笑(“啊，不要难过，拉尔夫——更糟的还在后面”)，但实在应该有个真正的派对才好。不光是办公室里的小伙子们，还有埃迪，还有所有朋友都应该有所表示。而现在只有去白玫瑰酒吧见埃迪，就像这年中的任何一个晚上那样，然后坐车回埃迪家取他的旅行包，然后吃饭，然后一路坐车回曼哈顿，去见格蕾丝，待上一两个小时。他到酒吧时，埃迪还没来，这更让他觉得孤独，心头隐隐作痛。他郁闷地饮着啤酒等埃迪。

埃迪是他最好的朋友，理想的好男人，因为起初想追求格蕾丝的是他。就是在这间酒吧里，拉尔夫跟他说了他们去年的第一次约会：“喔，埃迪——好大一对波啊!”

而埃迪咧开嘴笑了，“是吗?她那个室友长什么样?”

“啊，你不会喜欢那个室友的，埃迪。那个室友是条狗、势利小人，我想没错。但是这个，这个小格蕾西——伙计，我是说，魔鬼身材啊!”

第三章

每次约会后，至少一半——甚至更多的欢乐都来自于找埃迪倾诉，还不时添油加醋、吹牛，要埃迪出主意接下来该如何行动。但从今后，这、还有许多其他的快乐，都将被抛在身后。格蕾丝答应过他，结婚后，至少每星期有一天可以跟他那帮朋友玩，但即使这样，一切也全变了。姑娘们是无法理解友谊这种东西的。

酒吧里的电视在播一场棒球赛，他百无聊赖地看着，失落的感伤痛苦让喉咙都有点肿痛。他几乎将一生都投入了男人间的友谊，努力做一个好伙伴，而现在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结束了。

终于埃迪用硬邦邦的手指戳了戳他屁股，算是打了招呼。“你在干嘛，伙计？”

拉尔夫心中渐生厌恶，眯起眼睛，慢慢转过身来。“你怎么啦，滑头？走错路了？”

“你干嘛——急什么？”埃迪说话时嘴唇几乎不动。“你不能等两分钟吗？”他懒懒地坐在高脚凳上，身子转了半个圈，对侍应生说：“杰克，给我来一杯。”

他们喝着酒，盯着电视，一声不吭。“今天发了一点奖金。”拉尔夫说，“五十块。”

“是吗？”埃迪说，“不错啊。”

电视上三击不中出局；一局结束，广告开始了。“那么？”埃迪说，摇着杯子里的啤酒。“还是准备结婚？”

“为什么不？”拉尔夫耸了耸肩。“听着，快点喝好吗？喝完这杯，我想走了。”

“等会儿，等会儿，你急什么？”

“快点，行不行？”拉尔夫不耐烦地起身离开酒吧。“我想去拿你的包。”

“啊，包，不就是个包嘛。”

拉尔夫又走回来，怒冲冲地盯着他。“听着，滑头。没人强迫你借我那该死的包，你知道。我不想伤你心或什么——”

“好了，好了，好了。去拿包吧。别那么着急。”埃迪喝完啤酒，擦擦嘴。“走吧。”

为了蜜月旅行向埃迪借包是拉尔夫的心头之痛;他宁愿自己买。他们每晚搭地铁都要路过的那家皮包专卖店的橱窗里就摆着一个大大的、茶色格拉德斯通旅行提包(注：(Gladstone)，美国一种品牌的旅行包，款式为中间对开。)，两边还各有一层拉链，39.95元——拉尔夫自从复活节起就看中了。“想想吧，我要买下它，”他随口告诉埃迪，就像那天他宣布订婚那样不经意(“想想吧，我要娶那个姑娘”)。埃迪的两次反应都一样：“你——疯了吗?”两次拉尔夫都说，“那又怎么样?”他还为这个包找理由，“结婚了，我需要这样的东西。”从那时起，好像那个包就是格蕾丝本人，象征着他追求的崭新而阔绰的生活。但在付完戒指、新衣服和所有其他开销后，终于发现他买不起了;他只好向埃迪借，两个包看上去一样，但埃迪的包档次低得多，也旧很多，更没有拉链。

现在他们又经过这家皮包专卖店，他停下脚步，突然冒出个草率的想法。“嘿，等等，埃迪。知道我想怎么花这五十块钱吗?我要买下这个包。”他呼吸有点急促。

“你——疯了吗?四十大元买个一年用不上一次的包?你疯了，拉尔夫。快走吧。”

“啊——我不知道。你觉得呢?”

“听着，你最好还是留着你的钱吧，伙计。你以后会用得着的。”

“啊——好吧，”拉尔夫终于说。“我想你是对的。”他追上埃迪，朝着地铁走去。他一生中遇的事总是这样的;只有在涨薪水后他才能拥有那样的包，他认了——只有结婚后他才能得到他的新娘，这个事实他也只有无条件地接受，想到这里他生平第一次低声叹了口气。

地铁吞没了他们，经过半小时的叮铃哐啷，摇摇晃晃，神思恍惚，最后地铁将他们扔在皇后区清凉的黄昏里。

他们脱下外套，松开领带，让晚风吹干刚才因走路而流汗湿透的衬衣。“那我们怎么办？”埃迪问。“明天我们该什么时候在宾夕法尼亚的小乡村露面？”

“啊，随便你们，”拉尔夫说。“晚上什么时候都行。”

“我们到那里后做什么呢？在那见鬼的小山村里你能做什么，啊？”

“我不知道，”拉尔夫辩解说。“我想也就是到处坐坐，说说话吧；跟格蕾丝的老爸喝啤酒，或干点什么；我不知道。”

“天啊，”埃迪说。“那以后周末你时不时得去。这可真够你受的。”

拉尔夫突然怒火攻心，在人行道上停下来，他把有点湿的外套团在手里。“嘿，你这个杂种。没人请你来，你懂吗——你、马梯或乔治，随便你们哪个。我把话说明了，我可不需要你们赏脸，懂吗？”

“你怎么啦？”埃迪问道。“你怎么啦？难道不能开个玩笑？”

“玩笑，”拉尔夫说。“你开不完的玩笑。”他跟在埃迪后面一步一步往前挪，十分生气，觉得自己都快要掉眼泪了。

他们拐进那条住了多年的街区，街边有两排整齐划一、一模一样的房子，他们在那里打架，在那里游荡，玩棍子球，一齐长大。埃迪推开他家前门，催拉尔夫快点，门廊里花椰菜、套鞋散发出的家庭气息扑面而来。“进来吧，”他边说边用大拇指朝关着门的客厅指了指，然后侧身，示意拉尔夫先进去。

拉尔夫打开门，往里走了三步，顿时惊呆了，好像下巴上遭到重重的一击。房里一片寂静，挤着一堆咧嘴笑的红脸男人——马梯、乔治，这个街区的所有小伙子，办公室的小伙子——每个人，所有朋友，都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瘦子马奎尔弓着腰站在竖式钢琴前，五指张开悬在琴键上方，当他敲下第一个欢快的和弦时，歌声脱口吼出，大家手握成拳打着拍子，一张张嘴咧得老大，歌词都走调了：

"他是个溃(快)乐的哈(好)小后(伙)

他是个溃(快)乐的哈(好)小后(伙)

他是个溃(快)乐的哈(好)——小后(伙)啊

没有人能否认!"

拉尔夫虚弱地后退一步，站在那里，眼睛瞪得老大，咽了口唾沫，手里还拿着外套。“没有人能否认!”他们还在唱，“没有人能否认!”正当大家要开始第二段时，埃迪秃了顶的父亲喜洋洋地从卧室门帘后走出来，嘴里唱着歌，两手各端着一壶啤酒。最后，瘦子在琴键上砸出最后一句：

“没——有——人——能——否——认!”

然后他们都欢呼着涌向拉尔夫，抓着他的手，用力拍着他的胳膊他的背，拉尔夫站那里浑身颤抖，声音淹没在众人的喧哗声中。“噢，伙计们——谢谢。我——不知道说什么——谢谢，伙计们……”

这时人群分成两半，埃迪慢慢走到中间，眼里闪着爱的笑意，手上不显眼地拎着一个旅行包——不是他自己的，是一个崭新的：大大的，茶色格拉德斯通旅行提包，两边都有层拉链。

“说几句!”他们喊道。“说几句!说几句!”

但是拉尔夫什么也说不出，也笑不出。他甚至什么都看不见。

十点了，格蕾丝开始咬着嘴唇，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如果他不来怎么办?不过，他当然会来的。她又坐下来，仔细抚平大腿周围尼龙裙上的折痕，尽量让自己平静下来。如果她太紧张，整件事就会给毁了。

门铃响起，她惊得像触电了似的。去开门时走到一半，又停下来，深深吸了口气，定下神以后她按下门锁，门打开一道缝，看着他上楼。

她看见他拎着旅行包在上楼，也看见他脸色苍白，神情严肃，她一开始还以为他知道了;他已经做好准备进门就把门锁上，再把她揽进怀内。“嗨，亲爱的，”她温柔地说，把门开大了一点。

“嗨，宝贝，”他一阵风似的扫过她身边，走进屋。“我来迟了，啊?你睡了吗?”

“没有。”她关上门，腰靠在门上，两手反在身后，握着门把手，这是电影里女主角惯用的关门姿势。“我只是——在等你。”

他没有看她，径直走到沙发边，坐下来，把旅行包放在他膝下，手还不停地抚摸着它。“格蕾西，”他说，几乎是在说悄悄话：“看看这个。”

她看着它，接着又看看他忧伤的双眼。

“还记得吗，”他说，“我跟你说过我想买一个这样的包？四十块？”他停下来，四处看看。“嘿，玛莎呢？她睡了吗？”

“她走了，亲爱的，”格蕾西说，慢慢移到沙发前。“她走了，整个周末都不在。”她坐在他身边，靠近他，给他一个玛莎式的特别笑容。

“噢，是吗？”他说。“那好啊，听着。我说过我不买了，向埃迪借，记得吗？”

“嗯。”

“所以，今晚，在白玫瑰酒吧那儿，我说，‘快点，埃迪，我们走，去你家拿你的旅行包。’他说，‘啊，不就是个包嘛。’我说，‘怎么回事？’但他什么也没说，懂吗？所以我们就回他家去，他家的客厅门关着的，知道吗？”

她身子蜷得更紧，又向他靠近了一些，把头靠在他胸膛上。他很自然抬起一只手，搂过她的肩，接着说道。“他说，‘走啊，拉尔夫，开门啊。’我说，‘搞什么鬼？’他说，‘没什么，拉尔夫，开门啊。’所以我就推开了门，噢，天啊。”他的手指紧紧抓住她的肩膀，那么用力，她害怕地抬起头来看着他。

“他们全在那里，格蕾西，”他说。“所有的家伙。弹钢琴，唱歌，欢呼——”他声音有点飘乎，眼睛紧紧闭上了，看得出睫毛湿了。“一个意外的大派对，”他说，想要笑笑。“为我举行的。真想不到啊，格蕾西！这时——这时，埃迪走过来——埃迪走过来，递给我这个包，和我这段时间看中的那个包一模一样。他用自己的钱买下了，他什么也没说，只想给我个惊喜。‘给你，拉尔夫，’他说。‘我只想让你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好的家伙。’”他的手又捏紧了，哆嗦着。“我哭了，格蕾西，”他

低声说。“我实在忍不住。我想他们这群家伙没有看到，可实际上我哭了。”他扭过脸去，极力咬着嘴唇，不让眼泪掉下来。

“你想喝点什么吗，亲爱的？”她温柔地问道。

“嗯，没什么，格蕾西，我很好。”他轻轻把旅行包放在地毯上。“不过，给我根烟吧，好吗？”

她从茶几上拿了根烟，放到他嘴里，帮他点着。“我给你倒杯酒吧，”她说。

烟雾中他皱了皱眉，“你有什么酒，雪利酒？不，我不想喝那东西。再说，我满肚子啤酒。”他仰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接着埃迪的妈妈给我们做了一桌子好吃的，”他接着说，声音差不多恢复正常了。“我们吃了牛排，炸薯条”——他的头靠在沙发上，每说一道菜名就转动一下，“生菜西红柿沙拉，泡菜，面包，黄油——应有尽有。”

“好啊，”她说。“那不是很美吗。”

“接下来，我们还吃了冰淇淋，喝了咖啡。”他说，“我们敞开肚子，能喝多少就喝了多少啤酒。我是说，好丰盛的菜啊。”

格蕾丝双手抚摸着大腿，一半是为抚平尼龙上的折皱，一半是为了擦干手掌上的汗。“哦，他们可真是太好了，”她说。他们静静地坐在那儿，好像过了很久。

“我只能呆一会儿，格蕾丝，”拉尔夫最后说。“我答应他们我还回去的。”

她的心在尼龙睡裙下跳得扑通直响。“拉尔夫，你——你喜欢这个吗？”

“什么，宝贝？”

“我的睡裙啊。我本来打算在结婚后才穿的，但是我想我——”

“好看，”他像个商人似的，用拇指与食指捻了捻那轻纱样的东西，问：“很好。你花了多少钱，宝贝？”

“哦——我不知道。可是你喜欢它吗?”

他吻了吻她，终于紧紧抱住她。“很好，”他接着说。“很好。嘿，我喜欢这衣服。”他的手在领口那里犹豫了一下，滑进睡衣里，握着她的乳房。

“我真的爱你，拉尔夫，”她低声说。“你知道，是吗?”

他的手指揉捏着她的乳头，一次而已，马上又飞快地滑出来。数月以来的禁令，这习惯太强了，他没法打破。“当然，”他说。“我也爱你，宝贝。现在做个乖女孩，睡个好觉，我们明天早上见。好吗?”

“哦，拉尔夫。别走，留下来。”

“啊，我答应过那帮家伙，格蕾西。”他站起来，理理衣服。“他们在等着我呢，都没回家。”

她腾地站起来，迸发出一声大叫，这声音从她紧闭的双唇中发出来，是一个女人，一个妻子哀怨的呼喊：“他们不能等等吗?”

“你——疯了吗?”他退后几步，双目圆睁，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她该理解才是。该死的，如果结婚前她就这样了，结婚后她会怎么样呢?“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今天晚上让他们等着?在他们为我做了这许多之后?”

那一两秒钟，她的脸似乎没有他以前觉得的那么美了，但马上她脸上又露出一丝微笑。“当然不能，亲爱的。你是对的。”

他走上前来，手温柔地抚过她的下巴，微笑着，做出一个丈夫的保证。“这样才对，”他说。“明天早上九点，我在中央火车站等你。好吗，格蕾西?只是我走之前——”他眨眨眼，拍着肚子。“我满肚子啤酒。不介意我用用你的卫星间吧?”

当 he 从洗手间出来时，她站在门口等着道晚安，双手抱在胸前，好像是为了取暖。他可爱地提起新旅行包，晃了晃，也站到门口来。“好了，那么，宝贝，”他吻了吻她说，“九点。别忘了。”

她疲惫地笑了，为他开门。“别担心，拉尔夫，”她说。“我会在那里的。”

一点也不痛

麦拉在车后座上挺直腰，推开杰克的手，抚平裙子。

“好了，宝贝，”他笑着低声说，“放松点。”

“你才放松点，杰克，”她对他说。“我是说真的，松手!”

他的手听话了，犹疑不定，但胳膊还是懒懒地搂着她的肩膀。麦拉没理他，只望着窗外出神。这是十二月末一个星期天的傍晚，长岛的街道看上去破旧不堪；肮脏而结了硬壳的雪堆在街边人行道上，打烊的酒馆里，纸板做的圣诞老人斜眼瞟着外面。

“让你一路开车送我来，真不好意思，”麦拉大声对正在开车的马蒂说，她想礼貌点。

“这没什么，”马蒂嘟囔着。接着他按响汽车喇叭，冲着前面一辆开得很慢的卡车喊道：“你这狗娘养的，让路啊。”

麦拉有点不安——为什么马蒂总是这样爱发牢骚？——但马蒂的妻子爱琳，蜷缩在前排座位上，友好地笑了。“马蒂可不在乎，”她说。“这对他也好，星期天出来走走，总比躺在家里要好。”

“啊，”麦拉说，“真的太谢谢了。”其实她宁愿像往常一样，自己坐公共汽车。四年了，每个星期天她总是来这里探望丈夫，她已习惯了走这段长长的路。她喜欢在亨普斯特德的小咖啡馆停一会儿，喝口咖啡，吃点蛋糕，再从那里换车回家。但是今天，她和杰克一同去爱琳、马蒂家吃饭，吃完饭已经很晚了，马蒂提出说开车送她去医院，她只好同意。当然，爱琳得跟着来，杰克也要，他们这样做好像帮了她好大一个忙。所以你还得有礼貌。“这可真是太好了，”麦拉叫道，“坐小车去那里，而不是坐——不要这样，杰克!”

杰克说：“嘘——，别紧张，宝贝，”但她把他的手一甩，扭过身去。爱琳看着他们俩，咬着舌头扑哧笑了，麦拉觉得自己脸红了。其实没什么不好意思的——爱琳和马蒂都认识杰克，清楚他们的所有事情；她的许多朋友也是，没人责备她（毕竟，她跟寡妇也没什么两样）——只是杰克应该更识趣些。他现在就不能庄重点，管住自己的手吗？一路上

都是这样。

“好了，”马蒂说。“现在我们可以节约点时间了。”那辆挡路的卡车转上另一条路，他们加快了速度，将有轨电车、商店抛在身后，小巷变成大路，接着驶上高速公路。

“想不想听广播，伙计们？”爱琳叫道。她打开收音机，里面的人在怂恿大家今晚都坐在自己家里看电视。她换了个频道，另一个声音在说，“没错，在克劳福德商场您的钱可以买到更多东西！”

“把那狗娘养的东西关了，”马蒂说，又开始按喇叭，车上了快车道。

当车子开进医院，爱琳在前座里转过身来，说道，“嘿，这地方可真漂亮。真的，这里不是很美吗？噢，看啊，他们还摆了一棵圣诞树，上面还有小灯什么的。”

“好了，”马蒂说，“往哪走？”

“往前直走，”麦拉告诉他，“直开到圆盘那里，就是摆圣诞树的地方。然后向右转，绕过行政大楼，开到那条路的当头。”他按她说的转了弯，当他们慢慢驶近那又长又矮的肺结核大楼时，她说，“到了，马蒂，就是这栋楼。”他把车靠向路边停下，麦拉收拾起给丈夫带的杂志，下了车，地上铺着层薄雪。

爱琳缩起肩膀，双手紧紧搂着自己身体，转过身来，“噢——喔，外面好冷，是不是？听着，亲爱的，你要多久才完？八点，是吧？”

“对，”麦拉说，“可是听我说，你们几个不如先回家？我可以坐公共汽车回去，我平时都这样。”

“你以为我是谁，疯了吗？”爱琳说。“你以为我愿意开车回去，让杰克在后座上一路闷闷不乐吗？”她咯咯笑了，还朝麦拉挤挤眼。“你在车里，他都难得开心，更别说让他自个儿回家了。不，听着，亲爱的，我们到别处逛逛，可能去喝点酒什么的，然后八点准回这儿来接你。”

“嗯，好吧，但是我真的宁愿——”

“就这儿，”爱琳说。“八点准，我们就在这栋楼前等你。现在快走

吧，把门关上，我们快冻死了。”

麦拉笑着用劲摔上车门。可杰克还在那里不高兴，头都没抬，也没朝她笑笑，或挥挥手。车子慢慢开动了，麦拉沿着这条路走过去，走上肺结核大楼的台阶。

小小的会客室里一股水蒸汽和湿套鞋的气味，她飞快地穿过，经过标有“护士办公室——清洁区”的门，走进阔大、嘈杂的中心病房。中心病房里有三十六张病床，中间一条走道将它们分成两半，再用齐肩高的间隔区分成开放式的小格子间，每个格子间里六张病床。所有床单和病服都染成黄色，好与医院洗衣房里其他未被污染的衣物分开，这种黄色与墙面的灰绿色搭配在一起，让人恶心，麦拉到现在还不习惯。而且噪音也让人难以忍受，每个病人都有一台收音机，好像所有人同时都在收听，听的还不是同一个频道。不少床边有人来探望——有个新来的男病人躺在病床上，双手搂着妻子在接吻——其他病床上的男人看起来很孤独，有看书的，有听收音机的。

麦拉走到床边丈夫才发现。他坐在床上，盘着腿，皱着眉，盯着膝盖上的一件东西。“你好，哈里，”她说。

他抬起头。“哦，嗨，亲爱的，没有看到你来。”

她弯下腰，飞快地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有时候他们会吻在嘴唇上，但别指望每次如此。

哈里扫了一眼他的手表。“你来晚了。是车晚点了吗？”

“我不是坐公共汽车来的，”她边说边脱下大衣。“我搭顺风车来的。我们办公室的那个女孩，爱琳，还记得吗？她和她丈夫开车送我来的。”

“噢，那很好。为什么你不请他们进来坐坐？”

“哦，他们不能久留——还要去别的地方。但是他们向你问好。给你，我带了这些来。”

“噢，谢谢，太好了。”他接过杂志，把它们摊在床上：《生活》、《柯里尔》和《大众科学》。“太好了。亲爱的。坐下来，呆会儿。”

麦拉把她的大衣搭在床边发椅子背上，坐下来。“嗨，查恩斯先生，这儿，”她向隔壁床上的高个黑人打招呼，他朝她点头致意，咧开嘴笑了笑。

“你好吗，威尔逊太太？”

“挺好的，谢谢，你呢？”

“噢，抱怨是没用的，”查恩斯先生说。

她瞥了一眼哈里床另一边的里德·奥梅拉，他躺在那边床上听收音机。“嗨，里德。”

“噢，嗨，威尔逊太太。没看到你进来。”

“你妻子今晚来吗，里德？”

“她现在星期六过来，昨晚来过了。”

“哦，”麦拉说，“好，告诉她我问她好。”

“当然，我会的，威尔逊太太。”

接着她朝对面小格子间里的老人笑了笑，她老记不住他的名字，从来也没人看望过他。他也朝她腼腆地笑了笑。她在小钢椅子上坐下，打开手提包找香烟。“你膝盖上是什么东西，哈里？”这是一个浅色木环，一尺来宽，织好的蓝色羊毛线挂在两边的小齿上。

“啊，这个吗？”哈里举起它说。“他们管这叫耙式针织法。是他们给我做职业疗法时学的。”

“什么针织？”

“耙式针织。拿起这个小钩，像耙草一样把羊毛线上下钩到每个小齿上，就像那样，绕着这个圆环一圈一圈地织，直到你编出一条围巾，或绒线帽——或某种这类的东西。明白吗？”

“噢，我知道了，”麦拉说。“就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做过的那样，只不过我们是用一个普通的小线轴，上面卡着些钉子。你将线绕在钉子

上，穿过线轴，就编好了。这是一样的。”

“噢，是吗？”哈里说。“用一个线轴，啊？是的，我想我妹妹以前也是这样做的，现在我想起来了。用一个线轴。你是对的，这个原理一样，只不过大一点。”

“你打算织个什么东西？”

“哦，我不知道，我只是无聊打发时间罢了。我想可能会织个绒线帽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仔细端详着这个耙式织物，又翻过来看，然后探起身，把它扔到床头柜上。“只是找点事做而已。”

麦拉把香烟盒递给他，他抽出一根。当他弯下腰凑过来对火时，黄色病服的领口敞开了，她看到他的胸脯，瘦得令人难以置信，肋骨被取掉的那边都凹进去了，看得到上次手术后刚刚愈合的伤疤，难看极了。

“谢谢，亲爱的，”他说，香烟在他嘴里一抖一抖。他往后靠着枕头，穿着袜子的脚在床上摊开伸直。

“你感觉怎样，哈里？”她问。

“还好。”

“你看上去好多了，”她撒了个谎。“如果能再长胖点，看上去会更好。”

“交钱，”透过喧闹的收音机传来说话声，麦拉四处看了看，只见一个小个子男人坐在轮椅上从中间走道上过来。他坐在轮椅上，却慢慢用脚在走。用手转动车轮时会牵扯到胸部，肺结核病人要避免这样做。他径直朝哈里的病床走过来，张嘴笑时看得到满口黄牙。“交钱，”轮椅到哈里床边停下来，他又重复了一遍。一根橡胶管从他胸前的绷带里露出来，从病号服上头绕过，用安全别针固定住，末端是个小小的，塞着橡胶瓶塞的小瓶，放在他胸前的口袋里，显得很重。“快点，快点，”他说，“交钱。”

“噢，对！”哈里笑着说。“我全给忘了，华特尔。”他从床头柜的抽屉里拿出一美元，递给那个男人，那人瘦瘦的手指把钱叠好，放进口袋，

跟瓶子放在一起。

“好了，哈里，”他说。“扯平了，是不是?”

“是的，华特尔。”

他把轮椅向后倒，转过来，这时麦拉看见他前胸、后背和肩部缩成一团，整个都变形了。“抱歉打扰了，”他说着，朝麦拉微弱地笑了笑。

她微微一笑。“没什么。”当他走回到过道时，她问，“你们刚才是什么意思?”

“噢，我们为星期五晚上的拳击比赛打赌来着。我早把这事给忘了。”

“噢。我以前见过他吗?”

“谁，华特尔吗?我想你见过，亲爱的。我刚动完手术那会儿，你肯定见过他。华特尔这家伙大约两年前动过手术;他们上周又把他送回来了。这家伙过了段难熬的日子。他很勇敢。”

“他病服上是什么东西?那个瓶子是干嘛用的?”

“那是引流管，”哈里说着靠回黄色枕头。“华特尔这家伙是个好人;我很高兴他又回来了。”接着他压低声音，偷偷地说，“事实上，病房里没剩几个好人了，那么多老人都走了，或者动手术去了。”

“你不喜欢这些新来的人吗?”为了不让新来的里德·奥梅拉听到，麦拉也悄声问。“看起来他们对我挺好的。”

“噢，我想，他们是不错，”哈里说。“我只是说，嗯，我习惯和华特尔那样的人呆在一起，就这样。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事情什么的。我不知道。这帮新来的家伙有时候让你心烦，尤其是他们说话的方式。比如，他们个个都觉得自己很了解肺结核，他们自以为什么都懂;我是说，你没法跟他们说什么，这样做让你心烦。”

麦拉说她觉得自己明白他的意思，不过换个话题似乎更好。“爱琳觉得医院很漂亮，圣诞树也很好看。”

“噢，是吗？”哈里很小心地探过身子，往床头柜上一尘不染的烟灰缸里弹了弹香烟。自从长期卧病在床以来，他变得很精确很整洁了。“上班怎么样，亲爱的？”

“啊，我觉得还好。我跟你说过一个叫詹妮特的姑娘因为外出吃午餐的时间太长而被炒掉的事，还记得吗？我们大家都很害怕他们会再严厉整顿半小时的午饭时间。”

“噢，是的，”哈里说，但麦拉看得出他根本不记得了，也没认真听。

“嗯，现在好像平息下去了，因为上周爱琳和另外三个姑娘在外面差不多待了两个小时，也没人说什么。她们中有个叫露丝的，一直担心自己会被炒掉，已经一两个月了，这次也没人说她。”

“哦，是吗？”哈里说。“嗯，那很好。”

接着停了一下。“哈里？”她说。

“什么，亲爱的？”

“他们跟你说了什么新情况吗？”

“新情况？”

“我意思是，有没有说你另一边也要动手术？”

“哦，没有，亲爱的。我跟你说过，会有好长一段日子我们别指望听到什么消息——我想，我以前跟你解释过。”他眯缝起眼睛微微一笑，表明他认为这是个十分愚蠢的问题。很久以前，当她问“你觉得他们什么时候会让你回家？”时，开始他也总是给她一副同样的表情，现在他说，“问题是最近这一次手术我还要恢复。你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手术后你得休息很长一段时间，才能真正脱离危险，特别是我这样在最近——多久了——四年内有过衰竭记录的人。没有，他们什么也没有说，他们做的就是等待，我不知道，也许六个月，也许更长，要看这边的恢复情况。那时他们才会决定另一边。也许再动一次手术，也许不动了。在这事上你不要有任何指望，亲爱的，你知道的。”

“不，当然，哈里，我很抱歉。我不是有意问这么愚蠢的问题。我

只是说，嗯，你感觉怎么样。你现在还痛吗？”

“不痛了，再也不痛了。”哈里说，“我是说，只要我不把手抬得很高什么的。我这样做时会有点痛，有时候睡觉时往这边翻身也会痛，但只要我——你知道——保持正常的姿势，啊，就一点也不痛。”

“太好了，”她说，“不管怎样，听你这么说，我真高兴。”

好长一段时间两个人都没话说，收音机的嘈杂声、其他病床上的笑声、咳嗽声让他们的沉默显得很怪异。哈里开始用拇指随意翻着《大众科学》。麦拉的眼睛四处逡巡，最后落在床头柜的相架上，一张放大的快照，是他俩结婚前拍的。那是在密歇根州她妈妈家后院里拍的。照片中她看上去十分年轻，穿着1945年时的裙子，双腿修长，那时候她根本不知道怎么穿衣打扮，甚至不知道怎么站立，什么都不知道，只会用孩子般的笑容来迎接一切。而哈里——奇怪的是哈里在照片里看上去比现在还老一些。可能是因为大脸庞和结实的身材，当然还有衣服也起了作用——他穿着件深色的、艾森豪威尔夹克(注：(Eisenhower jacket)，1945时流行的短夹克式样，胸前两个口袋，有点像空军军装。)，还有铮亮的靴子。噢，他以前真好看，方方的下巴，深灰色的眼睛——比现在好看多了，比如说，比那个矮胖壮实的杰克要好看得多。可现在瘦得嘴唇、眼睛都软了，让他看上去像个瘦小男孩。脸型也变了，正好配上那件病服。

第四章

“你给我带来这个我真高兴，”哈里指的是《大众科学》，“上面有篇我想读的文章。”

“好啊，”她说。她也想说：“难道就不能等我走了再看？”

哈里用手轻弹着杂志封面，遏制着想看的冲动，说，“其他怎么样，亲爱的？我是说上班之外的其他情况。”

“还好，”她说。“我那天收到妈妈的信，就是圣诞贺卡。她问你好。”

“好，”哈里说。最后还是杂志赢了，他又把杂志翻开，翻到他想读的那篇文章，随意读了几行——好像只是确定一下是不是他想读的那篇——接着就掉进那篇文章里了。

麦拉就着上根香烟的烟蒂又点燃一根，拾起一本《生活周刊》，开始翻着。她不时抬起头看看他；他躺在那里，一边啃着手背上的指关节，一边看着杂志，用蜷着的那只脚的脚尖挠另一只脚的后跟。

余下的探访时间他们就这样打发的。快八点时，从走道那边来了一群人，说笑着推着一架有橡胶轮脚的钢琴合成器过来了——这群人是星期天晚上的红十字会节目的演出人员，巴拉彻克夫人领头，她身穿制服，是个和蔼粗壮的女人，由她演奏钢琴合成器。一个男高音推着钢琴跟在后面，他面色苍白，嘴唇总是湿乎乎的。一个臃肿的女歌手、女高音，穿着塔夫绸衣服，看上去手臂下面紧梆梆的，还有个手提公文包、表情刚毅、身体瘦弱的女低音。他们推着带轮子的钢琴靠近哈里的床边，他的床几乎就在整个病房中间。巴拉彻克夫人打开节目单。

哈里抬起头，“晚上好，巴拉彻克夫人。”

她的眼镜片闪闪发光。“今晚还好吗，哈里？今晚想不想听几首圣诞颂歌？”

“行啊，夫人。”

收音机接二连三地关上了，谈话声也静下来。但就在巴拉彻克夫人正要敲下琴键时，一个矮胖的护士插进来，穿着橡皮鞋的脚重重跺了跺走道地面，同时伸出手来挡开音乐声，她好宣布什么。巴拉彻克夫人坐下，护士伸长脖子，先对着走道这边叫道，“探访时间结束！”接着又转过身，冲另一边叫道：“探访时间结束！”然后她朝巴拉彻克夫人点点头，消过毒的亚麻口罩后有一丝微笑，再跺跺脚走了。经过片刻小声的商量，巴拉彻克夫人开始弹起开场曲“铃儿响叮当”，她双颊摇晃着，遮盖住离开的探访者造成的混乱，歌手们在休息，小声咳嗽；他们要等听众都安静下来后再开始。

“呀，”哈里说，“我没发现这么晚了。来，我送你到门口。”他慢慢坐起来，脚在床沿边悬空晃着。

“不，别麻烦了，哈里，”麦拉说。“你躺着别动。”

“不行，没事的，”他边说边趿拉着拖鞋。“你能把那个长袍递给我吗，亲爱的？”他站起来，她帮他穿上灯芯绒VA浴袍，那浴袍对他来说太短了。

“晚安，查恩斯先生，”麦拉说，查恩斯先生冲她咧嘴一笑，点点头，接着她向里德·奥梅拉和那个上年纪的男人道晚安。他们在走道上经过华特尔的轮椅旁时，她跟他道别。麦拉扶起哈里的胳膊，惊恐地发现胳膊那么瘦，她小心翼翼地跟着他缓慢的步伐。会见室里，他们面对面站在一小群笨拙的访客中间。

“好了，”哈里说，“照顾好你自己，亲爱的。下周见。”

“噢—喔，”有个母亲厚实的肩膀探出屋外说，“今晚好冷。”她回身进来，朝儿子挥挥手，然后抓住丈夫胳膊，走下台阶，走上铺满雪的小路。另外有人拉住门，让它开着，好让其他访客出去，冷风都灌进房间里来，接着门又关上了，只剩哈里和麦拉在屋里。

“好了，哈里，”麦拉说，“你回去听听音乐，睡觉吧。”他站在那里，浴袍敞开着，看上去非常虚弱。她走上来，帮他掩上、理好，遮住胸口，把吊在腰间的腰带系紧。他微笑着看着她，“现在你回去吧，别感冒了。”

“好的。晚安，亲爱的。”

“晚安，”她说，踮起脚尖，吻了吻他的脸颊。“晚安，哈里。”

她站在门口，看着他身穿系得紧紧的高腰浴袍，往病房走。她走到外面，下了台阶，突如其来的寒冷让她竖起衣服领子。马蒂的车还没来：路上空寂一片，路灯下，只有几个访客稀疏的背影艰难地朝行政大楼附近的车站走去。她把大衣又紧紧裹了裹，紧贴大楼站着，想躲开大风。

里面“铃儿响叮当”唱完了，听得到隐约的掌声，过了片刻，节目正式开始了。几个庄严的和弦在钢琴上奏响，歌声传了过来：

“听啊！天使高声唱，

荣耀归于新生王，……”

麦拉嗓子眼突然给堵住了，街灯打她眼里漂过。她把半个拳头塞在嘴里，可怜地抽泣着，呼出的团团热气飘逝在黑暗里。好久好久她才停下来，每吸一下鼻子，弄出好大声音，仿佛几里远都听得到。最后，她终于平静下来，或差不多平静了；她尽量控制自己的肩膀，不要抖得太厉害，然后擤擤鼻子，扔掉手帕，公事化地啪地合上了包。

这时路尽头闪现出车灯。她跑到路上，站在大风里等着。

车里一股温暖的威士忌味道，几点樱桃红的烟头闪烁着，爱琳大声叫道，“噢——喔！快点，关上门！”

车门一关上，杰克的胳膊就搂过来，他沙哑地低声道：“你好，宝贝！”

他们都有点喝醉了；甚至马蒂也精神亢奋。“抓紧了，各位！”当他们转过行政大楼，经过圣诞树时，他大叫道，车子平稳笔直地驶出大门，加速。“各位，抓紧了！”

爱琳的脸在晃动，喋喋不休的声音从前座漂过来。“麦拉，亲爱的，听着，我们发现一个最可爱的小地方，就在路那头，有点像那种路边旅店之类的，便宜得要命！所以听着，我们想再带你去那儿喝点东西，好吗？”

“好啊，”麦拉说，“当然好。”

“我是说，我们已去过了，不管怎样，可我想你也去看看那里……马蒂，你能不能小心点!”她大笑道。“老实说，换了其他什么人，喝了这么多酒，再开这车，我都会吓死的，你知道吗?但你永远不用为老马蒂担心。他是世界上最棒的老司机，我根本不担心他喝没喝醉。”

但他们没有听到。他们在热吻，杰克的手滑进她的大衣里，熟练地四处摸摸，又探进里面的衣服，直到握住她的乳房。“还生我气吗?宝贝?”他的嘴停在她的唇上，低声哼着。“想不想去喝一杯?”

她的手紧紧搂着他坚实的背，抱着不放，然后自己转过身，这样他的另一只手可以偷偷滑进她的大腿根部。“好的，”她低声说，“我们喝一杯，然后——”

“好的，宝贝，好的。”

“——然后，亲爱的，我们回家。”

自讨苦吃

沃特·亨德森九岁那会儿，有阵子觉得装死是最浪漫的事，小伙伴们也这样看。他们发现警察抓强盗的游戏中真正有意思的就是假装被枪打中，捧着胸口，扔掉手枪，卧倒在地。不久，大家就撇开游戏的其他部分不玩了，如选择站在哪边，偷偷摸摸地到处躲藏什么的，麻烦得很，他们只玩游戏的精华部分。结果这游戏就成了一场个人表演，几乎像门艺术。每次会有个人从山顶上冲下来，跑到指定的地方，受到伏击：许多把准备好的玩具手枪同时扣动扳机，喊哑的嗓门七嘴八舌响起——一种沙沙的“砰!砰!”轻响——这是男孩们在模仿手枪的声音。接下来，表演者要站住、转身、摆出优雅的痛苦姿势，并停留片刻，然后一头栽倒，手脚并用滚下山坡，卷起一阵尘土，最后趴倒在地，成了一具皱巴巴的尸体。然后他站起来，掸去身上的泥土，这时其他伙伴就开始评论他的形体姿势(“好极了，”或“太僵硬，”或“不太自然”)，然后轮到下一个上场。这就是整个游戏了，沃特很喜欢。他个头瘦小、协调能力差，这是唯一他能胜任的、有些类似于体育运动的活动。他蜷着身子滚下山去的样子，没人能比得上他的这种狂热，他陶醉在大家的欢呼声中。后来，年纪大点的孩子嘲笑他们，其他孩子也慢慢厌倦了这个游戏;沃特只有勉强地加入到其他益智游戏中去，不久他也把这忘记了。

二十五年后一个五月的下午，在莱克星顿大道的办公大楼里，沃特坐在桌前假装工作，等着被解雇。他突然想起了这个游戏，而且印象深刻。现在的沃特看上去是个沉着冷静、头脑灵活的年轻人，身上的衣着有东部大学的校园风，整洁的褐色头发，只是头顶有点稀疏。多年的健康让他结实了不少，虽然他的协调能力还有点小问题，但主要都是些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像戴帽子、掏钱包、拿戏票、找零钱等，总要让他妻子停下来等他；还有，门上明明标着“拉”，他却总是用力去推。不管怎样，在办公室里，他看上去是一副整洁有能力的样子，现在没人能看得出他背后冷汗直流，也看不到他左手藏在口袋里，慢慢捻着纸板火柴，一根根撕着，弄得火柴纸板湿乎乎、黏嗒嗒，成了一团。他好几周前就明白这迟早是要发生的。今天早上，从步出电梯时起他就感觉到，就是今天了。当他的几个上司对他说，“早上好，沃特”时，他就看出了他们微笑下隐藏的一丝微弱的关切之情；下午，他从工作的格子间里往外瞟了一眼，正好与部门经理乔治·克罗威尔对了眼神。克罗威尔在他的私人办公间内，手里拿着一叠文件，正犹豫不决。一对上眼神克罗威尔立即一个转身，但沃特知道他在看着自己，虽然他有点烦恼，但主意已定。他肯定，几分钟之后，克罗威尔会叫他进去，公布这个消息——当然有点困难，因为克罗威尔是那种老板，总以平易近人为荣。现在没什么可做的，只能顺其自然，尽可能优雅地接受。

儿时的回忆突然袭上心头，他突然想到——这让他的指甲深深掐入口袋内的纸板火柴里——顺其自然，优雅地接受，从某种程度上说已经成了他生命的一种模式。当然无需否认，做一个体面的失败者对他诱惑力太大了。整个青春期，他都沉溺于此，与比他强壮的男孩打架时，总是勇敢地输给对方；打橄榄球时无心恋战，心底下偷偷渴望受伤，被抬出场外（“不管怎样，你们得给亨德森这家伙一下，”高中教练曾哈哈笑着说，“他可真有点自讨苦吃”）。大学为他的这种才华提供了广阔的展示空间——考试不及格，竞选落败——后来，空军又让他体面地品尝了一次被淘汰的滋味，没能进飞行军官学校。现在，看起来，他不可避免地要再体会一次了。在这份工作之前他所干的都是刚入门的活，不容易出错；遇到这个工作机会时，用克罗威尔的话说，这份工作“是一个真正的挑战”。

“好啊，”沃特曾说。“这正是我想要的。”当他将谈话的这部分告诉他太太时，她说，“哦，太棒了！”有了这份工作，他们搬进了位于东六十街的高级公寓。近来他回家时总是一副筋疲力尽的神态，阴沉着脸宣布他怀疑自己是不是还能坚持下去，她总是命令孩子们不要去打扰他

(“爸爸今晚很累”), 给他拿上一杯喝的, 用一个妻子的小心安慰让他平静下来, 尽量掩饰她的恐惧, 从不猜测, 至少从不显露出她在与一种慢性强迫症式的失败打交道, 在与一个奇怪的小男孩爱上的崩溃心态打交道。而令人惊异的是, 他想——真正令人惊异的是——他自己之前还从没这样看待过自己。

“沃特?”

格子间的门给推开了, 乔治·克罗威尔站在那里, 看上去有点不太自在, “你能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吗?”

“好的, 乔治。”沃特跟着他出了隔子间, 穿过办公室, 感觉背后有无数双眼睛。保持尊严, 他提醒自己。重要的是保持尊严。接着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 就他们两人单独在克罗威尔铺着地毯的安静的私人办公室里了。远远地, 从二十一层的楼下来汽车喇叭声, 其它能听到的就是他俩的呼吸声、克罗威尔走过办公桌时鞋子的嘎吱声、他往扶手椅上坐下时, 椅子发出的吱吱声。“沃特, 你也拉把椅子坐下,” 他说。“抽烟吗?”

“不, 谢谢。”沃特坐下来, 两手紧扭在一起, 放在膝盖中间。

克罗威尔啪地一声合上香烟盒, 把它推到一边, 自己也没抽。他俯身向前, 两手摊开, 撑在桌上的玻璃板上。“沃特, 我还是直接跟你说了吧,” 他说。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有趣的是, 即使早就有准备, 它还是让沃特一惊。“我和哈维先生考虑了很久, 我们觉得你跟不上这里的工作, 我们都不愿得出这样的结论, 那就是: 最好的办法是, 对你、对我们都有利的办法是, 请你走。不过,” 他飞快地加上, “这不是对你个人有什么看法, 沃特。我们这里工作是非常专业的, 我们不能指望每个人都能得心应手。特别是在你这儿, 我们真的觉得你在——能力所及的位置上, 会更快乐些。”

克罗威尔往后靠, 抬起两手, 玻璃上留下两只湿乎乎的手印, 像骷髅的手。沃特盯着手印, 被它们吸引住了, 看着它们慢慢变小, 消失。

“哦,” 他抬起头来, 说道。“你说得很对, 乔治。谢谢。”

克罗威尔张开嘴充满歉意而友善地笑了。“发生这种事情,” 他说, “实在太糟糕了。”他开始摸索办公桌抽屉的把手, 一脸如释重负的

表情，最难说出口的已经说了。“好了，”他说，“我们开了张支票，是你这个月和下个月的薪水，它能给你一点——可以说是解雇费吧——让你在找到事情之前度过难关。”他递过来一个长信封。

“您真是太慷慨了，”沃特说。接着一阵沉默，沃特认识到该由他来打破这沉默，于是站起来。“好吧，乔治。我不会赖在这里的。”

克罗威尔立即起身，绕过办公台，两手都伸出来——一手握着沃特的手，一只手放在他肩上，就这样走出了办公室。这姿势，看似友好，实则令人窘迫，让沃特血直涌上喉咙，有那么一刻十分难受，他以为他会哭出来。“好吧，伙计，”克罗威尔说，“祝你走运。”

“谢谢，”沃特说，听到自己的声音还很平静，他松了一口气，于是他又微笑着说，“谢谢你，再见，乔治。”

回他的格子间大概要走五十米的距离，沃特·亨德森颇有风度地走完了。他感觉得到，在克罗威尔眼里，他的背影相当整洁、笔直；他也意识到，在他穿行在办公桌间时，那些办公桌的主人要么不好意思地扫他一眼，要么让人感觉他们很想这样，他也知道他脸上每一个表情都控制得很好，很微妙。整个事情看上去像是电影里的一个场景。摄影机从克罗威尔的角度开始往后移动，拍摄出办公室的全景，沃特的背影在画面中孤独而庄严地走过；现在是沃特的脸部特写，定格了很久，然后再给同事们转动的头几个简单的镜头（乔·科林斯看上去很担忧，弗雷德·霍尔姆斯试图让自己看上去不那么开心），接着镜头切换到沃特的角度，看到的是他的秘书玛丽那平凡、毫无疑心的脸，她手里拿着一叠他交待要打印的东西，正站在他办公桌前等他。

“我希望这可以了，亨德森先生。”

沃特接过来，扔到桌上。“别管它了，玛丽，”他说。“你瞧，接下来你还是歇着吧，明天早上去找人事经理。他们会给你安排份新工作的。我被解雇了。”

她听后脸上展露出一丝略带疑惑的笑——她以为他在开玩笑——但她马上脸色发白，有点哆嗦。她还很年轻，人也不太机灵；秘书学校里可从没人教过她，老板也可能被解雇。“为什么，这太可怕了。亨德森先生。我——呃，可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噢，我不知道，”他说。“有许多小理由，我猜。”他在不停地打开、合上抽屉，清理他的东西。没有多少东西：一沓从前的私人信件，一支干了的自来水笔，一个没有打火石的打火机，半块包着的巧克力。她在边上看着他将这些物品一一清点出来，装在口袋里，他意识到这些物品让她十分伤感，他觉得要保持尊严，便挺直腰，转身从衣帽架上取下帽子带上。

“对你不会有影响的，玛丽，”他说。“他们早上会给你安排新工作。好了——”他伸出手，“祝你好运。”

“谢谢你;你也是。好，那么，晚安”——她掩着嘴吃吃地笑了，手指甲被咬得歪歪斜斜的，笑得不太肯定。“我的意思是，再见，亨德森先生。”

接下来的场景发生在自动饮水机旁。当沃特走近乔·科林斯身边时，科林斯冷静的双眼充满同情。

“乔，”沃特说。“我走了。被开掉了。”

“不!”但科林斯震惊的表情只不过是一种友善的表示;它不可能是吃惊。“天啊，沃特，这些人可真见鬼!”

弗雷德·霍尔姆斯插话了，语调低沉，十分遗憾，显然这个消息让他很满意：“呀，伙计，真他妈遗憾。”

他们一路跟着沃特到了电梯口，他按了“下行”键;人们突然从各个角落冲向他，他们脸因悲伤而僵硬，他们的手都伸了出来。

“太遗憾了，沃特……”

“好运，伙计……”

“保持联系，好吗，沃特?……”

点头、微笑、握手，沃特不停地说，“谢谢，”“再见，”还有“我当然会的”;这时红灯亮了，随着叮的一声电梯到了!几秒钟之内，电梯门缓缓地滑开，操作员的声音在说，“下行的!”他退进电梯里，微笑定格在脸上，朝那些热情的、表情丰富的脸，自信地鞠了一躬，这个场景最后以电梯门缓缓合上、关紧而告终，电梯在沉默里一路下行。

下来时，他和一位脸色红润，目光明亮，十分快乐的男子并排站着；直到他走到大街上，飞快地走着，他才意识到自己有多享受刚才的表演。

这个想法让他吃惊，脚步也放慢下来，他在一幢建筑物前停下，站了大半分钟。头皮在帽子下阵阵发痒，手指开始摸索着领结和大衣的钮扣。他好像因做了什么隐晦而可耻的勾当，十分震惊，自己从没这般无助，这般害怕过。

接着他又猛然做出一连串举动，理理帽子，动动下巴，在人行道上踩着两脚，试着让自己看上去像忙于工作，匆忙急躁的样子。如果有人下午在莱克星顿大道上想要分析自己的心理，那他简直疯了。唯一可做的是马上让自己忙碌起来，开始找工作。

他又停下来，四处看看，发现问题是他根本不知道要去哪里。他现 在上四十街，在有花店和出租汽车站的拐角上，来往行人衣着光鲜，英姿勃勃，走在春天明媚的大街上。他首先需要一部电话，他冲过街对面，走进一家杂货店，穿过香皂、香水、调味番茄汁和火腿的混合气味，来到后面墙边的一排电话亭边；掏出地址簿，找到记有几家职业中介电话号码的那一页，他已在那几家中介那里填过登记表；接着他准备好零钱，把自己关在电话亭里了。

但是所有中介说的话都相同：眼下没有适合他专业的工作机会；没有他们的电话通知，就是去他们公司也没用。当他打完一圈电话，他又到处摸索地址簿，想找一个熟人的电话号码，那人以前跟他说过，他们公司可能很快就会有合适他的职位空出来。可是小本本不在他的内口袋里；手又伸到大衣的另一个口袋里、裤子口袋里找，手肘挤在电话亭的墙上生疼，但找到的只有那沓旧信件和他办公桌里的那块巧克力。他嘴里咒骂着，把巧克力扔到地上，好像它是香烟头，还踩上几脚。电话亭里的这些动作让他发热、呼吸急促。就在他开始头晕时，突然看见地址簿就在他前面，在投币箱顶上，是他自己放在那里的。他一只手哆嗦着拨着号码，另一只手扯开衣领，脖子上早已汗津津了，等他张口说话时，声音听上去已像个虚弱而焦急的乞丐。

“杰克，”他说。“我想问问——只是问问而已，你前阵子说过的那个职位空出来了吗？”

“什么空出来?”

“职位。你知道。你说你们公司可能会有个工作——”

“噢，那个呀。没有，什么消息也没有，沃特。如果有消息，我会跟你联系的。”

“好吧，杰克。”他推开电话亭的门，靠在押花锡墙上，对着迎面而来的一股新鲜空气，大口喘着气。“我以为你可能忘了这事，”他说。现在声音几乎正常了。“抱歉打扰你了。”

“见鬼，没什么，”电话那头传来热情的声音。“你怎么啦，伙计?是不是你那儿有什么麻烦?”

“噢，没有，”沃特发现自己在这样说，他马上为此高兴起来。他几乎从没撒过谎，现在吃惊地发现原来撒谎竟这么简单。他的声音听上去有几分自信了。“没什么困难。我在这里很好，杰克。我只是不想——你知道，我以为你可能忘了，仅此而已。家里还好吧?”

电话打完后，他觉得除了回家无事可干，但还是在敞开着门的电话亭里坐了好一会儿，脚一直伸到杂货店的地面上去了，直到他脸上浮现出一丝难以察觉的，谨慎的笑容，这微笑渐渐消蚀，脸上又恢复了正常表情。刚才那么容易地说谎让他有了个主意，他想来想去，这主意就慢慢变成了一个意味深长，颇具革命性的决定了。

他不告诉妻子。走运的话，这个月他可能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同时，这可是他生平第一次自己独个儿承受困难。今晚，当她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时，他要说，“啊，还好，”他甚至会说，“不错。”早上他要在平时同样的时候出门，在外面呆上一整天，找到工作前他要一直这样。

他想起“打起精神，振作起来”这几个词，在电话亭里，除了这个决心外他还有好多方法让自己振作起来，收拾好硬币，理直领带，走到外面的大街上：颇有一点高贵气度。

在按时回家前还有几个小时要打发掉，他发现自己正沿着四十二大街往西走时，决定去公共图书馆消磨这几个小时。他费力地爬上宽宽的石头台阶，一会儿就置身于阅览室，在翻阅去年生活杂志的合订本了，心里一遍又一遍地想着他的计划，扩充它，让它更完美。

他显然知道，日复一日的欺骗可不容易。这需要罪犯般保持持续的警惕与狡诈。可是不正是因为计划如此困难才显出这样做的价值么？最后，当一切结束后，他会告诉妻子。这可是对每分钟的严酷考验的回报。他知道在他告诉她时，她会怎样看着他——开始一片茫然，难以置信，然后，慢慢地，她眼中会逐渐浮现出多年没有过的一丝尊敬。

“你是说这么久你一直独自承受着？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做，沃特？”

“噢，”他会很随意地说，甚至会耸耸肩，“我觉得没必要让你操心。”

到时间得离开图书馆了，他在入口处晃荡了一会，深深吸了口烟，看着下面五点钟拥挤的交通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这个场景让他产生了别样的怀旧之情。就是在这里，五年前那个春天的夜晚，他和妻子在这里开始了第一次约会。“你能在图书馆台阶最上面等我吗？”那天早上她在电话里问了好几遍，直到好几个月后，在他们结婚后，他才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约会地点。当他问起时，她朝他笑了。“去那里当然不太方便——可正是因为不方便，我才选的那里。我想站在那里，摆个姿势，像城堡里的公主那样，让你爬上那么多级可爱的台阶，来带我走。”

情况确实是那样。那天他提早十分钟从办公室溜出来，急冲冲赶到中央火车站，在明亮的地下更衣室里梳洗一番，还刮了胡子；那个年老矮胖、行动迟缓的服务员接过他的衣服，熨烫时，他直等得不耐烦。接着，给了那服务员一笔不菲的、自己平时难以承受的小费后，他向外冲出去，上到四十二街，当他大步经过鞋店和饮料店时，紧张得喘不上气，他一阵风似的在慢得无法忍受的人群中穿插，他们可不知道他的任务有多紧急。他害怕迟到，甚至还有点担心这是她耍的花招，她根本不会在那里等他。但当他走到第五大道，远远就看到她高高地站在那里，一个人，站在图书馆台阶的最上头，穿着件黑色大衣——身段苗条、黑色头发光彩夺目。

于是他放慢脚步，一只手插在口袋里，故作悠闲地穿过大街，步履像运动员般轻松随意，没人想得到他几小时前还那样着急，为了这一刻，连日来的设计、谋划还是值得的。

他相信她能看到他走过来。他抬起头来看她，她笑了。这并不是他第一次看见她那样笑，但肯定这是她第一次特意为他这样笑。他胸口里有股暖流穿过。现在他已不记得他们见面打招呼时说了些什么，但他

记得很清楚他们很投缘，一开始就很好——她大大的双眸望着他，他正想要她那样看着他。他说的那些话，不管是什么，都给她留下机智幽默的印象，而她说的话，或她说话的声音，让他觉得自己比以前都要高大、强壮、肩膀比以前要宽阔得多。当他们一起转身，走下台阶时，他紧紧抓着她的手臂，领着她，每走一步，他感觉到她的胸脯在他手背后轻轻跳动。夜晚来了，夜色在他们脚下铺开，在等着他们，它长得不可思议，浓得不可思议，昭示着他们的美好前途。

现在他一个人走下台阶，发现回顾过去，让他更快乐了。那是他生命中的一次，唯一的一次，拒绝了失败的可能性，他赢了。他穿过大道，沿着四十二街缓缓的斜坡往回走时，其他的回忆也涌出来：那天晚上他们也走了这条路，走到巴尔的摩去喝点东西，他还记得在鸡尾酒吧里她坐在圆沙发椅上，酒吧里半明半暗，她靠着，当他帮她脱大衣袖子时，她身子向前扭动，然后往后一靠，长发往后一甩，她举起酒杯，搁到唇边，同时向他飞了一个媚眼。过了一会，她说，“噢，我们去河边走走吧——我喜欢一天当中这个时候的河边，”他们离开酒店，走向河边。现在他也往那边走去，走过叮叮当当的第三大道，朝都铎城走去——那段路好像很长——直到他站在小栏杆边，俯看着东河道上光滑锃亮的车群，灰色的河水在它旁边缓缓地流着。就是在那儿，在皇后区灰暗的天空下有艘拖船轰鸣，他把她拉过来，第一次吻了她。现在，他转过身来，俨然是个焕然一新的男人，动身，回家。

他走进家门，第一件刺激他的事便是闻到了芽甘蓝香味。孩子们还在厨房里吃晚餐：他在盘子的叮当声里听得到他们大声咕哝着，还有妻子哄他们吃饭的声音，话语里透着疲劳。他关上门，就听到她在说，“爸爸回来了，”孩子们开始叫着，“爸爸！爸爸！”

他小心地取下帽子，放在门厅的壁柜里，刚转身，她从厨房走出来，在围裙上擦擦手，疲惫地笑着。“第一次准时回家，”她说。“我真担心你今晚又加班。”

“不，”他说。“我今晚不用加班。”他听着自己的说话声，古怪又陌生，在他耳朵里放大了好几倍，好像在一间有回响的房间里说话。

“你看上去很累，沃特。怎么累成这样了。”

“走路回家的，就这样。可能是我还不太习惯。都还好吧？”

“噢，还好。”可她自己看上去也累得够呛。

他们一起走进厨房，他立刻感到被厨房的湿润明亮给包围住，陷在这湿润明亮之中了。他的眼睛忧郁地扫过牛奶盒、蛋黄酱罐子，汤盆和麦片盒，窗沿上桃子摆成一线，还没熟，两个孩子柔弱娇嫩，叽叽喳喳说着话，小脸蛋上沾着点土豆泥。

进到卫生间，情况好多了。他在卫生间里呆了好久，远远超出洗手准备吃晚餐所需的时间。在这里至少他可以自己再单独呆上一会，他往脸上浇点冷水让自己振奋一点；唯一的干扰是妻子对大儿子不耐烦地提高了嗓门：“好了，安德鲁·亨德森。今晚你不吃完所有的奶油蛋糕，你就没有故事听。”不多久，传来刮盘子，叠盘子的声音，孩子们吃完晚饭了。又是一阵趿拉趿拉的鞋子声、摔门声，他们给放回自己房间，洗澡前要在那里玩上一小时。

沃特仔细擦干双手；走回起居室的沙发处，拿了一本杂志就窝在那里，他缓缓地、深长地吸了一口气，自己控制得还不错。没多久，她走进来，围裙已取下来，补了唇膏，还带着一只装满冰块的鸡尾酒大杯。“哎，”她叹了口气说。“谢天谢地，总算忙完了。现在可以安静会儿了。”

“我要喝点酒，亲爱的，”他一跃而起，说道。他希望他的声音听上去正常，但还是像在回音室里一样发出翁鸣声。

“不行，”她命令道。“你该好好坐着，让我来伺候你。你回家时看起来那么疲劳。今天过得怎么样，沃特？”

“噢，还行吧，”他说，又坐了下来。“挺好的。”他看着她量好杜松子酒和苦艾酒的份量，把它们倒进鸡尾酒杯里，搅动起来，手法简洁迅速，然后摆好托盘，端着它从房间那头走过来。

“给，”她紧挨着他坐下来，说，“能劳你大驾吗，亲爱的？”他往冰冷的杯子里倒好酒，她举起手中酒杯，说，“噢，太好了，干杯。”这种明快的鸡尾酒情调是她精心设计的，他知道。在带孩子们吃晚饭时，她严母的形象也是如此；大清早她快速扫荡超市，这轻快实用的效率也是如此；今天晚些时候，她倒在他怀里时的温柔也是如此。她生活中许多种情绪都在仔细有序地转换，或者可以说，这本来就是她的生活。她将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只有偶尔这样近距离地看看她的脸，他才能看到

为此她付出了多少。

酒开始起作用了。他呷了一小口冰凉的酒，开始很苦，但让他平静下来，手里的杯子看上去深得让人安心。他又呷了一两口，才敢看她，看她时目光鼓舞人心。她的微笑里几乎没有一丝紧张情绪，不久他们就像一对快乐的情侣放松地聊起来了。

“噢，这样坐下来，完全放松，多美啊！”她把头埋到沙发靠枕里说。“星期五的晚上多么可爱啊！”

“当然，”他说，但是立即把头埋在酒杯里来掩饰自己的惊慌。星期五晚上！这意味着还要过两天他才能出去找工作——两天囚禁在这温柔的家中，或在公园里骑三轮脚踏车，吃冰棍，根本不可能摆脱他的秘密。“真好笑，”他说，“我几乎都忘了这是星期五了。”

“噢，你怎么能忘掉？”她极享受地缩进沙发里。“我天天都盼着这一天。再给我倒一点，亲爱的，我又得干活去了。”

他又给她倒了点点，给自己倒了一大杯。他的手直哆嗦，洒出来几滴，但她好像根本没注意到。她没意识到他的回答越来越干巴巴，只有她自己在说话了。她回去干活了，往烤肉上抹油，给孩子们洗澡，收拾房间准备睡觉时，沃尔特坐在那里，杜松子酒的沉醉让他的思维滑入混乱之中。只有一个思绪浮现出来，自己只有一个建议，像酒般冰凉清冽，一次次冒到嘴边：挺住。无论她说什么，无论今晚或明天或后天发生什么，一定要挺住。挺住。

但是随着孩子们洗澡时泼水的声音飘进房间，挺住越来越不容易；到他们给领进房来说晚安时挺住可更难了。孩子们手里抱着泰迪熊，穿着干净的睡衣，小脸亮光光的，一股香皂的清香味，看到这一切之后简直不可能再在沙发上坐得住。他跳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香烟一根又一根地抽。听着隔壁房间里，妻子在绘声绘色地念着睡前故事，声音清晰：“你可以走进田野，也可以走小路，但千万不要走进麦克格里高的花园……”

她将身后孩子房间的门关上后，又走进来，看见他站在窗边，像一尊悲哀的雕像，望着下面黑漆漆的院子。“怎么啦，沃特？”

他转身过来，咧开嘴假笑一下。“没什么，”声音还是有空洞的回

音，电影摄影机又开始转动了。是他紧张的脸部特写镜头，接着切换到她这里，观察她的行动，她站在咖啡桌边，找东西。

“嗯，”她说。“我打算先抽支烟，再端菜上桌。”她又坐下来——这次没有往后靠，也没有笑，这是她忙碌、端菜上桌时的表情。“沃特，你有火柴吗？”

“有。”他走过来，在口袋里掏了半天，好似给她他珍藏了一天的东西。

“天啊，”她说。“看看这些火柴。它们怎么啦？”

“火柴？”他盯着那糊作一团，扭成一堆的纸板火柴，这似乎是无可辩驳的证据。“肯定是把它们撕了什么的，”他说。“紧张时的习惯。”

“谢谢，”她接过他颤抖的手递过来的火，她睁大眼睛、严肃地盯着他。“沃特，出什么事了，是吗？”

“当然没有。怎么会有什么——”

“说实话。是工作上的吗？是不是——你上周担心的？我是说，今天出了什么事会让你觉得他们可能——克罗威尔说什么了吗？告诉我。”她脸上的细纹似乎更深了。她看上去那么严肃，有魄力，突然老了许多，也不再美丽——一个惯于处理紧急事件，随时准备承担责任的女人。

他朝房间里一把舒服的椅子走过去，背影明确宣告失败即将到来。他在地毯边上停下脚步，身体好像变得僵硬，一个受伤的男人，把自己拼凑起来；他转过身，面对她，想朝她忧郁地淡然一笑。

“嗯，亲爱的——”他开口道。他的右手伸出来，摸着衬衣中间的钮扣，好像要解开它，接着长叹一声，颓然地向后倒进椅子上，一只脚耷拉在地毯上，另一只脚蜷在身下。这是他一天中做过的最优雅的事。“他们找我了，”他说。



ibook.178.com